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1月30日第29期 总第17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75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六）

目 录

【专 稿】

- 舒 声 试论文革中整学生的现象及其根源——以北京大学为例 2--16

【论 文】

- 胡鹏池 清华 727 事件——1968 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 17--36
——导言：以逻辑之手掀开历史暗窗

【评 论】

- 樊能廷 浅谈北大武斗所用器具及给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 37--45
——《北京大学纪事》正误与补充

【述 往】

- 谢引麟 我在清华“古拉格”92天 46--60
吴 琼 难忘的燕园·1969年（一） 61--71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三） 72--88
——红卫兵运动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八） 89--98
——接受再教育
王复兴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99--105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四）

【本刊声明】

【专稿】

试论文革中整学生的现象及其根源

——以北京大学为例

舒声

摘要

在北大文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包括工作组时期、校文革时期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时期，都发生了很多整学生的事件，学生被人为地划分成“左、中、右”，许多人被打成“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等，轻则被批斗、殴打，重则被送进监狱，还有一些被迫害致死，制造了很多惨案。本文记述并对比了北大文革不同时期学生被整的情况，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北大整学生是从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其根源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斗争哲学”的思想指导，当权者把有不同意见的群众视为敌人严厉打击，以维护自己的权力；提出只有彻底否定文革，摒弃人整人的政治路线和斗争哲学，建立民主和谐的法治社会，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类悲剧的产生。

在北京大学文革过程中，从1966年6月初-7月底的工作组时期，到1966年8月-1968年8月的校文革时期，再到1968年8月宣传队进驻，到1970年3月所有在校生毕业，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在这三个不同时期内，虽然情况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这三个时期都在不停地整学生。

一、工作组时期

1966年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2日零点30分，华北局工作组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宣布华北局决定：派工

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4日，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向学生讲话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向工作组指示：“要依靠群众，组织坚定的左派队伍，要争取中间多数，分化那些少数坏的，孤立打击最坏的。”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756-757）

工作组进校后，各系的工作组深入年级、班级，在“阶级分析”基础上，按照“亲不亲、阶级分”的路线和“扎根串连”的办法，依靠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学生各班级建立学生“文革小组”。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学生“文革小组”与工作组相结合，对同学进行“左、中、右”排队。

据化学系1963级学生华国藩回忆：

“03633班当时共有32名同学，经过张承先工作组和班级“文革小组”的“排队”，在学生中列出7名“右派”。这7名“右派”中，6名“家庭出身”为“黑五类”、“剥削阶级”，另有一名出身为“中农”的雷同学。雷同学“家庭出身尚可”，还曾任化学系团总支委员，做过“学毛选”的“讲用发言”，不知缘何被“文革小组”黑箱操作，搞成“右派”。而另外6位同学（其中一位女同学是归侨），没有任何言论或者行为，完全无辜地被加罪，搞成“右派”。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03633班学生“排队”结果不胫而走。“右派”是什么意思啊？1957年“反右斗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沦为异类，被开除、被下放、被劳改、被判刑乃至被残杀，受尽人间极致的残害，牵累全家，甚至波及九族。03633班在校内文革“风乍起”阶段，就已经被“文革小组”黑箱操作莫名其妙地“排队”为“右派”的七名同学，生死悬于一线，岌岌乎殆哉！”¹

类似化学系的情况在其他系也都存在，笔者所在的技术物理系也存在同样情况，由革命干

¹ 华国藩，“左中右排队”分裂了03633班，丛璋等编，《燕园风云录(四)》，2016年，97-98。

部出身和工人出身的班干部组成的班文革小组也给全班同学划分了“左、中、右”，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主张对“落后同学”多做政治思想工作。

6月18日部分学生未经工作组同意，在38楼门前设立“斗鬼台”，揪斗了一批所谓“黑帮分子”，引起了工作组的恐慌，当成了“重大事件”，一面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一面进行调查，收集情况，要抓出事件台前幕后的黑手。当晚，张承先在广播讲话中说有四个人带头打人、耍流氓，其中点了东语系学生陈某某的名字。6月20日，中央将北大工作组关于618事件的《第9号简报》批转全国。工作组为什么能很快抓出618事件中打人的主要分子，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保卫部门，其中有专业的保卫干部，如谢甲林，也有从法律系吸收的工作组认为“政治可靠”的学生，他们白天混在群众之中，盯着可疑的人，夜晚则拿着带闪光灯的相机拍摄大字报，把认为有问题的大字报洗出照片，辨认笔迹。这个保卫组继承了前苏联保卫部门的那套工作方法，很专业，效率很高，成为工作组的耳目和工具。

好在工作组当权时间不长，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狠整“右派学生”，自己就被灰溜溜地赶出学校了。那些排队的“黑材料”很多也被学生抄出来烧掉了。03633班的学生排队材料就是被工作组走后新当选的文革小组成员樊能廷亲手烧掉的。而第一个给工作组写大字报的地球物理系64级学生陈必陶被整了的“黑材料”则收藏在保卫组。

由于北大工作组在50天内没有和学生发生公开的正面冲突，中央文革又首先来到北大宣布了工作组的罪状，所以北大没有出现像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西安交大李世英那样因反对工作组而挨整而成为造反派领袖那样的人物；但是工作组期间把学生分类排队的做法直接制造了学生的之间的矛盾，是后来导致学生分裂成两派的渊源。例如03633班的被工作组划为“右派”和同情他们的学生后来参加了《北京公社》和《井冈山兵团》，而参与划分“左中右”的班文革小组成员和支持他们的学生则参加了《新北大公社》。

二、校文革时期

1966年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接管了北大，掌握了北大的领导权。校文革成立后，接收了工作组保卫组的班底，称为“二组”。

8月份到9月份，大部分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校内矛盾不突出。10月6日，物理系学生路远、周闯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10月份，围绕聂元梓组建北大“党组”等问题，原来和聂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逐步公开化，与此同时，北大各群众组织也发生了分化，逐步形成对立的两派组织，一派以“红旗兵团”为代表，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一派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聂元梓和校文革对反对他们的群众组织和学生给予坚决镇压，无情打击，把他们打成“反动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12月12日，红旗兵团召开大会，批斗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和在北大居住的外校退学学生杨炳章，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1967年2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这些被点名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在系内、班内受到批斗，被整了“黑材料”，有些还被抓进监狱关押（如杨炳章、何维凌、胡定国、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等）。

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和示范下，各系文革和校文革支持的“新北大公社”（1967年2月15日正式成立）也陆续对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或散布过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不满思想的学生进行批斗。例如中文系对陈一諮、沈达力（女）进行了残酷的批斗，沈达力不堪侮辱，被迫自杀。

陈一諮是中文系61级学生，共产党员，因在社教时期给党中央写信，表达对中央政策的不同看法，在文革中反对聂元梓，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3月17日下午1点，我被8个人从32楼押到第二教学楼，脖子上挂了一个沉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谔”的牌子，两个彪形大汉反剪我的双臂，让我坐着飞机，连踢带打把我押入了102教室。500人的教室坐满了中文系师生，由任××带领着高喊：“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谔！”“谁反对聂元梓就打倒谁！”、“陈一谔不投降就叫他减亡！”等各种打倒我的口号。

黄××主持会议，恶狠狠地讲了几句话上纲上限的话，走过来揪住我的头发让我“认罪”，我刚说了一句“我没罪！”就遭到一阵毒打。接着，新北大公社的骨干轮番揭发我“恶毒攻击”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江青同志、活学活用、反右派、不民主、社会主义、聂元梓和新北大红色政权等罪行，说几句就打一顿，头发一缕一缕揪下来，汗水和血水浸湿了地面。

开始，我还能有些反抗，高喊着：“你们实行法西斯专政！”、“聂元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照亮新北大！”但16个人分4个组不断轮换，将我倒架双臂、按上下身、揪住头发、仰头向上还不断殴打、脚踢，4个小时的酷刑折磨，使我渐渐失去了知觉，恍惚中，马××大喝一声，把我右臂给拧断了，任××又用腿把我左肋踢断了。我瘫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昏迷中我被几条大汉架出会场，倒拖着拉到32楼，扔到了宿舍的床上。依稀中感觉自己还有一丝游息，只要停止呼吸就可以死去。活着是那么艰难，死却非常容易。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了，可是又怎么能就这么死去呢！

混沌中似乎听到楼下高喊着：“沈达力畏罪自杀罪该万死！”的口号，心中吃了一惊。再细听，果然是沈达力自杀了？！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动弹不得，泪水从眼角不知不觉流了出来，我又昏迷了过去。”¹

¹ 陈一谔，《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104-105。

沈达力是中文系62级学生，因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组织“红联军”，而受到系文革和班文革的批斗。

笔名为“多思堂主人”的北大校友回忆：

“1967年3月12日，沈达力最后一次从上海的家中走出来，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因为批评了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她是被老佛爷的爪牙勒令回到学校“认罪”的。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但是她非常害怕，也许她已经预感到什么，她在家里做了准备。

她还不知道，“班文革”给她定下了“五大罪状”：

（1）“反对中央文革”

听说中央文革已经对北大的问题表态，校文革确定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沈达力却说“中央可能不了解情况，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说明她对中央文革是不信任的，对中央文革是有不满情绪的。在全校的大会上，她代表“红联军”发言，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校文革就是校文革。”这是公开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挑拨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2）“和反革命的边缘人物有关系”

沈达力和“红联军”的头目、“反革命分子”俞启义、张志握、赵丰田（均是哲学系学生）密切往来。对于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竟然说他们“也不一定是反革命。”

（3）“顽固反聂”

沈达力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红联军”，属于中文系的“猛虎团”，知道中央文革支持聂元梓后，还有些想不通，不知悔改，是一个“女干将”。

（4）“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沈达力的父亲曾在美国旧金山留学，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对父亲十分崇拜，关系十分密切，可见她“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5）“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沈达力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阶级烙印很深，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比较严重，经常爱出风头。

掌握大权的“班文革”早已得知她要回来了，3月11日就开始认真策划和准备对她的批判会。先是召开了全班的“揭发动员会”，接着布置其他各班配合行动的办法。几乎每个同学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了揭发批判的大字报。从11日晚上到12日白天，全楼道里无处不贴满了关于沈达力“罪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从一楼直贴上三楼的楼梯，从男生宿舍一直贴到女生宿舍，一直贴到她的门上。宿舍门的正面，是赫然醒目的《警告》，旁边是一些标语，包括：

“闻名全校的母老虎”、“母夜叉沈达力”、“沈达力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沈达力不投降是死路一条！”“沈达力必须低头认罪！”等等。几个女同学还在她的床头贴上一条毛主席语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

这是何等萧杀的气氛！

她浑身颤抖地看着这一切。她的精神防线已经崩溃了。

沈达力，不仅美丽，而且文雅。但她毕竟是一个天真善良，又有些懦弱的女孩，她是与所有女孩子一样很爱面子，也颇自尊的人。她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狂风恶浪！

3月13日清晨，她很早就起床了，这个爱干净的女孩没洗脸就开始抄写在上海家中起草的大字报《我的检查》，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外面。早饭后，她被叫到中文系男生居住的32楼看人们给她贴的各种大字报。与此同时，班里开始了“天天读”，“天天读”结束时，大家齐唱了语录歌：“人民靠我们去组织，……”和“凡是错误的思想，……”。散会后，“班文革”的一位领导小组成员找沈达力谈话，对她进一步施加了压力。

当晚，沈达力在全班的会议上做了第一次检查。她眼含泪水念完了自己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同学们则进行准备好的批判。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是“避重就轻”、“投机成性”、“蒙混过关”。结论是：“请罪没有诚意，再往下滑是危险的！”

3月14日，全校同学都被组织去参加“打倒谭震林”的游行了。她在宿舍里，一边哭，一边给母亲写信。中午，一个外校的老同学来找她，她痛苦地对那个同学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3月15日，她上午在宿舍里继续检查自己在几个月来的表现，因为下午她要在班里的批判会上进一步检查“罪行”。下午班级在各处张贴了海报，召开“沈达力问题串联会”。来了一些其他年级和其他班级的同学。串联会集中讨论三个问题：

- 1、沈达力曾经公开表示同意“红联军”赵丰田的“北大左派先天不足论”；
- 2、对中央文革认定“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想不通；
- 3、对于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认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对于这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决定要求沈达力交出她的“黑材料”。

晚上，“班文革”在沈达力宿舍的门外又贴出了一张《通令》，说她“犯下了滔天罪行”，逼迫她“立即交出全部黑材料。”深夜，她一个人在未名湖边转来转去，痛苦万分。抬头仰望天上的北斗，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至半夜11点多钟才回到宿舍。

3月16日，上午全班同学都去听农业科学院一个人到北大做报告，暂时没有人理睬她。

下午，“班文革”带领一些同学聚集在她的宿舍，十分严肃地要她交出“黑材料”。这时，沈达力的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她茫然地把自己的衣箱书箱打开，把本本、信件之类全摊在地上。她蹲在地上，把东西一件件拿给她们看，边翻边问：“这个你们要吗？”“那个你们要吗？”她的双手哆嗦着，满脸通红，汗水直往下流。

班级里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的某同学感到沈达力仍然有“抵触情绪”，立刻跑到不在现场的“班文革”领导那里汇报，说“沈达力不老实，不愿意交材料！”

这个人马上气势汹汹地赶到宿舍，恶狠狠地训斥道：“你还有好多材料怎么不交？”并命令同学立刻“查抄”。所谓“查抄”，就是完全不顾她的人格尊严，把私人的一切抖搂在大家眼前。

实际上，沈达力已经把一切“材料”都交出来了，包括前天即14日写的日记。

晚上，“班文革”领导亲自出马与沈达力“谈话”，没有人知道她们谈了些什么。

但是，在14日的日记中，沈达力已经写出了不想活下去的意思。这个“班文革”领导到底与她说了什么呢？

17日上午，全体学习《解放军报》社论和《文汇报》社论，沈达力也参加了学习，表面看是平静的。下午全系在第二教学楼开批判大会，批判的是一个曾经追求过沈达力的男生。主席台上，一个人揪住这个人的头发，几个人使劲反拧住他的胳膊。没有人认真听发言，只听到被批斗者的一声声惨叫。

不知道批斗会什么时候结束的。全场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沈达力一个人木然地呆坐在那里。

晚上，人们就在“红湖”岸边发现了她服毒自杀的遗体。的确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因为在宿舍的书包里，人们发现了她写的《遗书》。

当天，全系及时召开了大会，文革主任吕某说：“她的问题，死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死后就是敌我矛盾了！”

“班文革”决定：“立即召开声讨、揭发、批判大会，把她搞臭，肃清一切影响！开除团籍；把班里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一个女大学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一场“革命风暴”中。”¹

在校文革整学生的过程中，其保卫组（二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语系63级学生林江东(女)在回忆文章《不人云亦云》中写道：

“1967年7月16日傍晚，吃过晚饭，我在校园里浏览大字报，走到38楼门前时，看到有上百人聚集在门前，我好奇地凑上去。一个男同学用嘶哑的声音在控诉：“大家看，这

¹ 多思堂主人，沈达力之死-记述一个人性泯灭的故事，丛璋等主编，《燕园风云录（一）》，2012，196-200。

就是从校文革二组抄出来的所谓反动学生的黑名单，人数多达上百人，有中文系的张自修……，西语系的……东语系的陈小湘、林江东……”听到这里我一下子惊呆了。虽然前几个月受过两次批判，但仅限于班内，谁也没有给我定性。现在校文革二组竟然把我列入反动学生的黑名单，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一般，心中冤屈的怒火立即燃烧起来。

我走向宿舍，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心里便打定了主意：“绝不承认甚麽反动学生！”。我在桌上铺开一张红色的大字报纸，挥笔疾书：“惊悉校文革二组把一个青年学生列入反动学生的名单，这是对广大革命同学的迫害。我的父母都是跟随党和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军队干部。我虽然犯过错误，但热爱党和毛主席的红心始终不变。如果说我是反动学生的话，北大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是反动学生。我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黑夜终将过去。”放下笔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找到一个浆糊桶，连夜把大字报贴在了大饭厅东墙最醒目的地方。第二天清晨，大饭厅东墙周围挤满了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胆子不小，反动学生竟敢翻天！”“她对党和毛主席那么衷心耿耿，不像是反动学生。”我夹在人群里默默地听着，坚信自己是革命学生的一员。”¹

由此可见，在系内、班内受到批判的学生，他们的材料都上报到了校文革二组，二组整理保存了这些“反动学生”的材料，就是要在运动后期秋后算账，把这些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至少会把这些材料装入档案，让这些学生背一辈子黑锅。

1967年7月10日，“红旗飘”和“北京公社”等组织查抄了校文革二组驻地南阁和燕南园63号，抄出两批二组整的“黑材料”。查抄校文革的办事机构，当时确实属于大逆不道的“打砸抢”行为，但是抄出了大量整学生的“黑材料”，使一批学生免于被整，确实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1967年8月17日，北大校内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五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从此北大内部两派斗争更加公开化和白热化。聂元梓和校文革对井

¹ 林江东，文革与“不人云亦云”，丛璋等编，《燕园风云录（四）》，2016，53-54。

井冈山兵团的一把手牛辉林恨之入骨，收集了材料，上报江青，江青在 9 月 1 日点名“红旗飘里有坏人”，牛辉林被迫辞职。聂元梓支持的《新北大公社》将反聂最坚决的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绑架，严刑拷打，甚至用铁钉顶入膝盖，后将奄奄一息的樊立勤扔出，经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但成为终身残疾。1968 年 3 月 29 日校文革组织武斗队伍，将井冈山的学生驱赶出 31 楼宿舍，井冈山兵团被迫反抗后，聂元梓和校文革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井冈山学生占领的楼房断水断电，停发助学金和粮票，还派人到井冈山兵团的部分“骨干分子”家乡去抓捕，徐运朴、牛太升、王忠林等被抓捕后押回北大进行批斗。最近哲学系 66 级赵希文告诉笔者，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派人曾在他河南老家农村蹲守了 3 个月，都被大队支书顶了回去，其实他就在校内 28 楼，并未回老家；而同年级的女生韩琴英则被从山东抓回，带回北京，被刑讯逼供，以致流产。哲学系俞启义和地球物理系魏秀芬躲回了哈尔滨，新北大公社派人紧跟抓捕，由于当地公安部门保护，才幸免于难。

聂元梓和校文革利用《新北大》校刊，使其成为整学生的舆论工具。1968 年 5 月 9 日《新北大》第一版公布了“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把学生牛辉林打成“反动小集团坏头头”、把学生樊立勤打成“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1968 年 5 月 23 日第一版，公布“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第二号公告”，把学生张景元、俞启义打成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第四版：“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点了学生谢世扬、胡伯安、胡振初、王海、王培英、何维凌、胡定国、余水荣、臧希文、杨作森、乔兼武、魏秀芬、赵长占、刘立炎、范永奇和教师杨勋及杨勋弟弟杨炳章的名；1968 年 6 月 14 日第四版：“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把化学系 1963 级学生樊能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1968 年 7 月 17 日第三版：“关于老保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1968 年 7 月 23 日第三版：“我校首次公审现行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牛太升、王忠林、徐运朴”，把学生牛辉林、王忠林、牛太升、李怀进、王明德、屈长江、徐运朴、何本芳、唐竞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被校文革和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反动集团成员”的学生，虽然在工军宣队进校后有些人继续受到了审查，但绝大多数都按期毕业分配，少数被留校审查延期毕业的在文革结束后也都得到了平反。他们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努力工作，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其中杨作森、徐运朴因遭受批斗身体损伤，不幸过早离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头”的法律系 64 级学生牛辉林，1970 年分配到山西农村后，从公社秘书作起，先后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定襄县委宣传部理论组组长、山西省委宣传部干事、共青团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太原市政协常委、山西省引黄工程总指挥部秘书长、山西省引黄工程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2006 退休，2013 年因病去世。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化学系 63 级学生樊能挺，1970 年被分配到河北衡水地区，1978 年考上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完成硕士学业后又攻读博士，后成为教授、有机化学专家。井冈山的学生文革后没有一个被判刑和成为“三种人”的，这在高校群众组织中是少有的，也说明校文革制造的案件全部都是冤假错案。

三、宣传队时期

1968 年 8 月 19 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接管了校文革的权力。北大的群众对毛泽东支持的宣传队抱有很大希望。可是不久，希望就变成了失望。宣传队中的军队成员是由 4587 部队派出的，该部队在 1967 年 1-2 月份曾来北大负责军训，与聂元梓和校文革关系密切，一贯支持校文革。来北大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严厉打击干部、教师中的“阶级敌人”，短时期内就逼死干部教师多人；一方面又严厉打击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和分子”，而学生中的被打击的绝大多数都是原井冈山的成员。例如在井冈山成员比较多的化学系 63 级，被审查和批斗的学生就有 22 人，都是井冈山的成员和逍遥派，其中没有什么问题的广东籍学生李人杰，被打成反动学

生，由于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夜晚逃出学校，在清河农村牛棚里自缢身亡。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 62 级被审查的 3 名学生都是反对聂元梓的，63 级被隔离审查的 4 人，2 人是井冈山的骨干，2 人是没有参加组织的学生。此外哲学系的吴琼、历史系的姚成玉，都是井冈山的成员，地质地理系的王远枝虽然没有参加派别，观点也是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的头头牛辉林和侯汉清等，都被隔离审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押上全校大会批斗。

1968 年 12 月 18 日，由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被专案组审讯恐吓，导致夫妇双双自杀，最高领袖十分震惊，派迟群、谢静宜到北大调查，发现北大存在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的现象。1969 年春节后，8341 部队进驻北大，纠正“扩大化”，一批学生才得到了解脱。据谢静宜回忆，毛泽东指示她找牛辉林谈话，把牛辉林解放了出来。¹

在牛辉林的回忆文章里，也记述了谢静宜和他谈话的经过，证实了谢静宜的说法。²

8341 部队虽然解放了不少被整的学生，还创造了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但并没有完全停止整学生的行为，在 1970 年 3 月最后的三届毕业生分配时，还留下了部分学生不予分配，而是在学校和农场劳动接受审查，笔者所知，就有化学系的齐菊生、陈醒迈，技术物理系的程汉良、刘立民、何维凌、胡定国、王彦，地质地理系的王远枝等，分别在半年、3 年、8 年后才被分配，1978 年后才得到平反。

1971-1972 年，在全国清查“五一六集团”的运动中，宣传队又把一些留校的学生和已经毕业分配的学生当成清查对象，设立专案，进行隔离审查，逼迫他们写交代材料，互相揭发，但最终在学生中没有查出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

四、北大整学生的历史根源和指导思想

北大文革中不同阶段整学生的现象是一而贯之、一脉相承的。其实，这个整学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当时，部分青年学生响应整风的号召，提了一些意见，

¹ 谢静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 1 月，249-250。

² 唐竞编，怀念牛辉林，2016 年，302-306。

写了一些大字报，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有的被开除学籍、团籍，劳动改造，有些甚至被关押，著名的人物有林昭、谭天荣、沈元等（林昭和沈元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中央和北京市委认为前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右倾保守”，派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陆平接替，在北大原有的 500 多名右派中追加了 100 多名，使北大的右派名单达到 700 多名，超过了清华和全国其他高校。

60 年代初期，在高校中对持有“异端思想”的反动学生的整肃，一直都没有停止，例如 1964 年北大哲学系就整出了以 62 级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为首的“X 社”小集团，集团中一些学生被开除、劳改，郭世英被送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改造，1965 年重新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1968 年 4 月被迫害致死。

1966 年文革开始后工作组又把矛头指向学生，在学生中排队划线，企图抓出部分右派学生，杀一儆百。校文革和宣传队继承了工作组的衣钵，变本加厉地整“反动学生”，制造了一个个血腥的事件。

他们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斗争哲学”学得很好，用得也很好，整学生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和拿手好戏。

当然，他们并不是整学生的首创者，他们信奉和依赖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等一系列最高指示，在这些最高指示的指导下，他们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活跃的、有独立思想的、不听话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学生视为大逆不道，必欲整之而后快。在文革中，有一些学生通过实践和认真思考，逐步对中央文革、江青、林彪产生怀疑和不满，对文革本身也产生怀疑，在底下议论或写出大字报。还有一些北大学生，只是对聂元梓飞扬跋扈，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做法反感，参加了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有些还成了骨干，就都成了挨整的对象。有人说宣传队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于校文革时期，这是事实（主要是清队中自杀的干部教师数量多），但绝对不能因此说校文革就比宣传队好，他们整起学生来都同样毫不手软。说校

文革整死的人比宣传队少，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而已。

熟悉北大校史的人都知道，老校长蔡元培对学生十分爱护，五四运动中北洋政府抓走部分学生，蔡校长亲自交涉解救，不惜辞职表示抗议。后继者蒋梦麟和胡适，虽然不主张学生参加游行示威等政治活动，但从来没有把学生中的反对政府者交给当局，而对被捕的学生也出面保释。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也是如此，多次拒绝军警进校抓捕学生。而作为当时学校领导人(校文革主任)的聂元梓却在江青面前诬告学生牛辉林，在最高领袖面前诬告研究生侯汉清，由此可见聂元梓人品之卑劣。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当权者总是会把反对自己的甚至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视若敌人，进行打击迫害，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人人自危。这次运动你整人，下次运动你可能就成了被整的对象，试看那些老干部，在历史上哪个没有整过人，哪个没有挨过整？要真正杜绝人与人互相整的现象，必须深挖这种整人的思想理论基础，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斗争哲学，建立民主和谐的法治社会，才能避免文革悲剧在中华大地上再次重演。这也是我们彻底否定文革、反思文革的应有之义。■

【论 文】

清华 727 事件——1968 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

导言：以逻辑之手掀开历史暗窗

胡鹏池

目录

引子

一、逻辑推理要从时间排序着手

（一）一斤芝麻四两油

（二）常识要丰富，逻辑要致密

二、毛泽东“728 召见”的时间排序

（一）时间基点的确定：毛泽东看看手表

（二）从时间基点往下排：谢富治也有手表可看

（三）从时间基点往前推：周恩来打电话的三条线

（四）周恩来打电话给毛泽东的时间与缘由

（五）周恩来不打电话又能怎么样？

（六）工宣队为什么深夜向周恩来汇报请示？

三、这里的逻辑推理掀开了哪些历史暗窗？

（一）“728 召见”，蒯大富迟到 3 个多小时的真实原因

（二）“9003 血案”改变了短期的历史

四、我将一个巴掌举在这里，等着你来拍！

（一）“立场”与“自信”的唯一性

（二）对于逻辑推理的“结论”，只能“谨慎地自信”

（三）我将一个巴掌举在这里，等着你来拍！

引子

在众多校友直接或间接、形式多样的支持、帮助、参与下，历时近两年的时间，我与老朋友、老校友但燊先生合作的这本文稿终于杀青。

但燊是写“清华 727 事件”倡议者，他不仅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且也是个“角儿”，我不是。我于 1968 年 5 月初就回江苏老家了，直至 8 月底才回校。但燊对写“727”有心愿，我没有。但燊大约是欣赏我于 2013 年年初发表的《清华园的一只蝴蝶》（以下简称《蝴蝶》），才于这年年末邀我写这个题材，而我当时有很多顾虑，一拖就是一年多。

顾虑是多方面的，最主要顾虑是：这个题材太大太具体，远非《蝴蝶》能比。

《蝴蝶》是我的第一篇关于文革题材的历史文学作品，写的是蒯大富造反发迹肇始的清华“624 事件”，我恰是现场目击者。40 多年来，难忘的不仅仅是当年的精彩场面，同时还有当时的心中疑惑。一旦在校友网上开启话题，立刻引起众多校友的集体追忆，细节得以坐实与丰富，脉路更为清晰，下笔如流水，十天、八天的时间，文章就哗啦啦地写成了，对“624 事件”作出了既全旧又全新的解构，圆了我 40 多年的心愿。

而“清华 727 事件”的题材完全不一样，牵涉到对整个文革的分析与理解，必需掌握多得多的历史资料。首先要串得下去，圆得起来；其次要有新视角、新意思、新高度。一旦陷进去，才、学、识，各方面的功力肯定全都跟不上，需要大量搜集资料、阅读文献、排查梳理。我将所有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叫做“做功课”。不仅要“做功课”，而且还要“功课做到家”，没有一、两年时间肯定出不来。

恰在 2015 年初，一向以严谨认真的文风在校友中著称的张比同学在校友网上转载了谢静宜新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记》中“制止清华大学武斗”的章节，又引起了众多校友热议。我试着跟了几帖后就有了感觉，于是在 15 年 2 月 2 日，单开一个话题《七二七，七二七？？七二七!!!》，不同的标点符号分别代表叙事、探析与新意。此为始，由此将这个题材铺叙开去。

一年多来的过程，阻力真不小，困难真不少，过了一山又一山，几经反复，七搞八搞，总算是拢成了现在这部粗糙的“文稿”。理想的做法是搁置上个三年两载的，一边将其磨洗，一边让其发酵。但是，70 岁后的人生太宝贵了，没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在这一个题材上“耗”。不是“耗青春”啊，青春如小鸟，一去而不复；而是“耗夕阳”，“咫尺光阴十去八，尚余两寸话点嘛？”“话桑麻”还是“话清华”？

眼看着如血的夕阳挂在柳梢头，转瞬间就将沉入西海了，心何茫茫然！

我们商定的书名是：《清华 727 事件——1968 逻辑性历史文学探析》。

主标题直白，副标题有点“弯弯绕”，需将心意向读者坦露些许。

其一、我们毕竟是理工科出身。如果说清华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一定的数理逻辑水平，未免虚伪了，但我们确实不具备足够的文史哲学养。说句不怕遗笑的话，书稿是拿出来了，要是有人问这是什么体裁呀？我竟说不上。无非是历史与文学，究竟是以历史的叙事为主呢，还是以文学的虚构为主呢？我也不知道。

我的写作经历极短，严格讲来是从 2012 年 3 月母亲离世，为排遣失去十载来晨昏奉慈老娘亲后的悲痛、失落的心情，这才尝试从写作中回忆人生，寻找心灵归宿。我至今不能回忆母亲，一旦回忆就有阵阵的心痛；但我能回忆历史，两者的“心痛”程度不一样。

出道第一篇就是《蝴蝶》。接着在 2013 年，拙文《一个地主儿子的大学梦》、《1970 年大学生的婚礼》、《兰姑娘一家人》、《李楞子与外祖父》等相继在报刊发表时，¹我曾向一位北大文科出身的资深编辑请教：这些文章是什么体裁呀？ he 说是“纪实散文”，“纪实散文”有以人物为主，有以叙事为主，篇幅大就叫“大散文”。我说明白了。

而当《蝴蝶》、《田家英命案梳理与印证》等在网上发表后，²我也问是什么体裁？这位教授说：我也不知道，像你这种写法，不多见。我没有说什么，拿不准是褒还是贬？

后来看到北工大蒋健副教授写的《回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不

¹ 这几篇散文发表在 2013 年的《经济观察报》上，共 5 篇。现结集收在已在国内正式出版的胡鹏池散文集《芦花瑟瑟》中。2016 年 3 月初版。

² 胡鹏池：《通俗政治》，香港，天地图书，2015 年。

由得大声击节称好。我很推崇这篇文章，感到我的写法也有相似之处，都注重时间排序，通过推理与实证的结合来揭示历史事件真相。逐渐逐渐就有了一种认知，这仍然是一种普通的写法，虽有个人写作风格，却也未见得特殊。何况我们未经文科专业训练，写这样的题材，自然而然地就是这样一种写法。

其二、在写作过程中，时时感到真实史料的缺乏。“清华 727 事件”也是一出由工宣队、团派、414 派联袂演出的“三国演义”，可是缺少团派与工宣队亲历者的回忆。蒯大富、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对“清华 727 事件”语焉不详，其它几位重要人物几十年来集体失语，造成了“清华 727 事件”中存在着大量的历史暗窗，也就是许多人叫做“之谜”或“之秘”类的东西。

史料总还是有的。但官史真假难辨；野史良莠不齐；礼失诉诸野，少数亲历者的个人回忆固然珍贵，但往往择焉不精，且出于各自的立场、感情存在着一些不着痕迹的无意识及有意识的选择性失忆。

但我们仍然幸运，仍然有基础、有条件。前有唐少杰《一叶知秋》、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唐金鹤《倒下的英才》、邱心伟与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孙怒涛《良知的拷问》及《历史拒绝遗忘》等多部研究“清华文革”的重要著作出版在先，我们动笔之初又恰逢谢静宜新书出版，动笔之后不久又发现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这些书籍以及邱心伟、谢引麟、沈昆、顾耀文等校友的专题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史料，也提供了思考的多种角度。此外，我们还许多次与校友们聚会聊天，也搜集了一些资料；更有几位热心校友向我们提供了一些独家收藏的私密资料；可谓得助者众矣！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逻辑推理要从“时间排序”着手

任何历史作品都是人们的主观描述，任何历史事件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历史间断”。

如果我们具备了一定的史识水平，方法比较对头，肯下细致绵密的功夫，在尽可能多的掌握史料的前提下，许多“历史间断”是可以根据史料加以严谨的逻辑推理来进行衔接的；许多“历史画面”也是可以运用合理的主观想像来填补空白的。

这是本书两作者竭力主张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信念：

致密的逻辑推理能掀开历史的暗窗！（下文简称“逻辑掀开暗窗”）

（一）一斤芝麻四两油

研究任何重大历史事件，基本前提都是先要搞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

要搞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方法就是先要对事件进行时间排序。

如何进行时间排序？没有巧办法，只有笨办法。无非是要养成一个习惯，一边阅读，一边动笔，有意识地排出一个甚至几个“时间表”。

就研究“清华 727 事件”而言，需要排出策划者毛泽东的时间表，还要排出重要当事人清华两派头头蒯大富与沈如槐的时间表，在此基础上形成“727”的综合时间表。

“排时间表”要有开头，但不一定要有结尾，排到一定程度，心中就有经纬了。

“排时间表”当然是困难的。虽有困难，也要竭力，这一关闯不过去，下面的工作就难于进行了。有时并不是没办法，“柳暗花明”的佳境会在不经意时突然闪现；但有时“真没有”！

“真没有”也并不是“全没有”，资料多则多写，少则写少。一斤芝麻四两油（据说：更为准确的是四两一钱），油出多了就有水份与杂质，出少了就浪费原材料。

“以史带论”或“以论带史”都是可供选择的风格，但“论从史出”却是任何一个写史者必须坚守的态度。

（二）常识要丰富，逻辑要致密

如何进行时间排序？

最基本的方法：在所出现的一系列时间中，首先找出一个最可靠的时间点作基点，然后正过来往下排，反过来往前推。

相对而言，找“时间基点”并不是很困难的事，问题是如何往下排？又如何往前推？对此，笔者有两点体会：

- ① 要符合常识，而且常识要丰富。常识不丰富，是不解决问题的；
- ② 要符合逻辑，而且逻辑要致密。逻辑不致密，也是不解决问题的。

问题又在于所谓的“丰富”与“致密”都是相对概念，没有绝对标准。“共识”是有的，但也是相对的。你认为是“丰富”了，他也许认为是“狭隘”；你认为是“致密”了，他也许认为是“荒谬”。

一股道上跑的两套车，有前有后，也有并驾齐驱、互相招呼、相互启发的时候；两股道上跑的两套车，南辕北辙，认识上很难有交汇点。这种现象永远存在，也无法解决。“与秋虫者，不可语冰焉”，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俗话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有没有”的是什么？“有没有”的是基础。

常识与逻辑都必须建立在“四基”的基础上：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工具、基本技能。只有将“功课”做到家，基本概念搞清楚，基本功搞扎实，船到桥头直瞄瞄，功夫到了自然成。

我在校友网上提倡“常识与逻辑”之时，曾有校友反驳说：历史事件之所以不可知，那是因为有的事件本身就无常识无逻辑，而用“常识与逻辑”去推断无常识与无逻辑的历史事件，哪还能有什么正确结果呢？

其实，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与过程，即使从表面上看是多么的荒诞不经，如何地无常识与无逻辑，但其内里仍然充满了常识与逻辑。

笔者青年时代曾看过“福尔摩斯侦探故事”，虽然现在对具体故事、具体情节全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心得却永远铭记：案件初现时不仅扑朔迷离，而且鬼怪神异，甚至会出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无法解释，但最终破案之时仍然充满了“常识与逻辑”。

对“常识与逻辑”的这种认知，本身也是“常识与逻辑”。对此要有坚定信念，纵有三千弱水，我只取此一瓢饮。

当然“常识与逻辑”并不是“万能钥匙”，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之所以有的事件一时无解，第一位原因是客观上对史料的占有量不够，断档太多了。怎么办？既需要主动地继续积累，也需要被动地等待时机。第二位原因仍然是主观上的常识不丰富，逻辑不致密，需要不断地自我修为。此时就用得着“功夫在文章外”的古训了。

逻辑推理主要由三类定律组成：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溯因推理。它在任何研究领域都是必需的，是一种科学方法。许多科学门类从建立到普识，并不是靠实证，而是靠推理。

比如：地球天文年龄 45（46）亿年，地质年龄 41 亿年，生命起源 38 亿年（40 亿年？），人类起源 20 万年，地球人类都来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结论，如此宏大的问题其实证就是几块石头（骨头化石），靠的是技术测量与推理。

又比如，一些社会学科门类在引进了数学及逻辑推理后，从学科演进为科学。“生物学”引进了数学与逻辑推理后形成了“生物数学”；经济学中数学的广泛而深入的应用是当前经济学最为深刻的变革。

有朝一日，政治制度的选择，政策法规的制定都必须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将各种变动因素设置为系列修正系数，“政治学”也就演变为“政治科学”了！

二、毛泽东“728 召见”的时间排序

在我们这部文稿里，出现许多长短不一的时间排序的段子。

文稿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727 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

我们正是通过不断的时间排序，发现蒯大富在这个上午竟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空档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进而得出了蒯大富在727上午的时间表：

6点左右离开清华静斋（起点）去了北京火车站——8点左右离开北京站去了北航——9点左右在北航被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吴德的电话或广播找到了——10点左右从北航去了市委大楼见了吴德——10点至11点左右，吴德向蒯大富宣布了以中央文革或北京市革委的名义“派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一定执行——11点半不到离开市委——中午12点多回到清华静斋（原点）。

蒯大富727上午的去向是“727事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不是核心环节。作为解构整个“清华727事件”承上启下的核心环节是毛泽东“728召见”的时间排序。

下面我们围绕这个核心环节，说明“逻辑掀开暗窗”方法具体的“实战运用”。

（一）时间基点的确定：毛泽东看看手表

我们首先将有关“728召见”的重要资料找出来，就像拼图或积木游戏中的零件一件一件地展布在面前，立刻就会显现许多时间点。

以下是唐少杰、韩爱晶两位作者3份资料中显现的5个时间点：

①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118厅先仔细倾听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②7月28日3时30分至8时30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③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④毛主席看看手表，说：“现在八点多了，五个多钟头了。”

——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⑤谢富治说：“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顿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韩爱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

唐少杰先生是现职清华哲学教授，他是很早对清华文革史发生兴趣，且很早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但是他比我们年轻了10多岁，没有亲身经历清华文革。他的优势在于：

①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具有科班训练及专业素养；

② 他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清华文革时还能进入“清华档案馆”，系统地阅读到清华文革档案，并作了大量笔录，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档案资料；

③ 他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研究清华文革的专著《一叶知秋》，后来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份量较重的专题学术著作。

所以唐教授对“清华文革”具有建立在档案材料与系统研究基础上的全面了解。

“系统研究”与“全面了解”对一个学者是多么重要啊！有这个基础就有能力对别人的资料与文章进行比较与鉴别；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具有比较与鉴别的能力。

尽管如此，唐少杰先生仍然不是研究“清华文革”的初始者。美国人韩丁比他早了30多年。我主观猜测唐先生可能看过韩丁的《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韩爱晶先生虽然不具备专业学者的学术素养，但他是当年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是“728召见”重要亲历者；而且几十年来与蒯大富同荣同枯，始终保持了联系与友谊。韩

爱晶自己说：“至今 45 年间，虽思路各异，但命运相连。笔者对蒯大富的了解之全、了解之深可谓无人可及。”¹

笔者认同韩先生的这点“自信”，不仅重视他们的“命运相连”，也重视他们“思路各异”的意义。不过也要指出，韩先生毕竟不是清华人，他与清华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也无法弥补的隔膜。

在以上 5 个时间点中，选取哪一个作“基准”呢？

明眼人与明白人无需太多比较，都会毫不犹豫地选取“召见结束是 8 点多”。因为有“毛主席看看手表，说：‘现在八点多了，五个多钟头了’”这个细节支持，这就错不了了。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很穷，一般没有手表可看；而参加召见的首长们虽有手表，又都没有“看手表”的细节出现。

选准了基准时间点后，其它时间点都是可怀疑，也是可矫正的。

（二）从时间基点往下排：谢富治也有手表可看

先挑简单的做。在本例中“往下排”比较简单。

谢富治所说的“已经九点了”是准确的，因为谢富治也有手表可看。

这不仅说明了谢所说的时间是正确的，也反证了毛说的“八点多”也是正确的。

（三）从时间基点往前推：周恩来打电话的三条线

1、唐文所说开始时间是“28 日凌晨 3 点多”是可以的，但后面又将其精确为“3 时 30 分至 8 时 30 分”就有点小问题了。“3 点多”只能向前不能向下，否则“五个多钟头”就不成立了。

可以说“3 点多”，也可以说“3 点左右”，但不能说“3 时 30 分”。“召见”不是开正式会，不能精确成“30 分”。

¹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 516 页。

这个问题虽不大，也不用专门去订正，但研究者心中要有数。

2、正式召见前，毛泽东还与中央高层领导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即湖南厅）开了一个预备会，这意味着毛泽东到大会堂的时间是 2 点多。

由此推断唐文所说“听了汇报后再决定召见”是不对的。如果是“听了汇报后再决定”，那么韩爱晶接电话就不是“大概深夜 2 点钟”，而是大概 3 点钟；召见开始也不可能是 3 点多，而是将近 4 点了，整个时间全乱套了。

所以，“召见”是在毛周通电话时就已经作出的即时决定。

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纠正，一定要改过来。

但并不排除毛泽东到了 118 厅先听听各方面的情况汇报。

3、通知开会的电话不是从毛泽东住处直接打出去的。

毛泽东何等尊贵身份，他一般都不做这样具体的事。毛住处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做这样的事，起码是未见先例。

这一点判断不是常识，而是看多了回忆毛泽东与文革的文章后形成的“见识”。

“见识”与“常识”不是一个概念。“见识”虽没有“常识”可靠，但没有“见识”是不行的。“见识”是“局中人”与“局外人”，“当代人”与“隔代人”之间的重要差别。

排除了毛住处直接打电话的可能性，就可以断定所有的通知都是先经过周恩来发出去的。

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固然是事必躬亲，但不可能亲自通知除毛与他本人以外的其它 18 个人。如果都由他亲自通知，也不可能在 3 点多就开始召见了。

4、周恩来的电话通知有三条线：

- ① 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在京中央领导发通知；
- ② 通过市委副书记吴德，向市有关领导及五大领袖发通知；
- ③ 周恩来自己亲自给特殊的中央领导林彪、江青发通知。

这两个人的电话是由周亲自打的，因为周必需表现出对林副主席的尊重，也需要表现出对江青的尊重。

其实周恩来的内心是很烦江青这个专横跋扈、浅薄无聊、自以为是的“鸟女人”的，有很多精彩的小故事能说明这一点。但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周在与江青打交道时不得不谨慎，处处地方给她留点小面子，而江青在这些小地方是很计较的。没有毛泽东，江青什么都不是；有了毛泽东，江青什么都是了。

这样的判断同样不是常识，而是见识。

5、吴德也有两条线：

① 由吴德通知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委托刘通知五大领袖；

② 吴德亲自通知北京市委及北京卫戍区有关领导。

但是，周恩来是不是直接向吴德布置的呢？也许他先通知的是谢富治，再由谢布置吴呢？

这是不一定的事。如有出入，也无关紧要。

且在吴德回忆中有“我做具体找这些人的工作，会议开了不长的时候，就允许我参加了”为证。¹

6、所以，韩爱晶接到的电话已经经过了三道手：周恩来—吴德—刘丰。

韩爱晶回忆说他接到通知“大概是深夜两点钟”，基本事实，无需质疑。

（四）周恩来打电话给毛泽东的时间与缘由

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

1、周恩来是在什么时间给毛泽东打电话的？

毛泽东卫士回忆说“凌晨两点多”，韩爱晶说接到通知“大概是深夜两点钟”，两者相同，实际上是相互矛盾，断不可能同时成立。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45页。

笔者由此推断：周恩来电话必然早于2点钟，应在1点半钟左右。

2、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刚刚睡下的毛泽东打电话？

周恩来是一个爱护毛泽东、一向以极为谨慎的态度配合着毛泽东的工作，同时又是守纪律、按惯例办事的人，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在毛休息的时候去打扰毛。即使有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向毛汇报或请示，也一定要先问一下毛住处的人：“主席睡了吗？”如果没有睡，他就会在电话里请示汇报，或者亲自赶到毛的住处来；如果毛已经睡了，那么再重大的事情也要等他睡醒了再说。

文革年代，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早已形成。那个年代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一切为了毛主席！毛主席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可是在728凌晨1点半钟左右，毛明明已经睡了，按照毛的作息习惯，很可能是刚刚睡，周恩来却让毛的身边人唤醒了毛接电话，这是罕见行为。

罕见行为必然有特殊原因。唯一的解释就是发生了极为重要、极为反常、超过了周恩来权力范围所能解决，但又必需马上解决的事。

这会是什么事呢？只能是他在1点钟左右接到了工宣队临时指挥部的电话，或者是工宣队直接派人当面向他汇报了清华发生的新情况，并向中央请示新办法。

这个新情况是周没有想到的；所请示的新办法也是周无法直接同意与批准的，不是他能自作主张决定的。

所以，周必须要请示毛，而且事在刻不容缓，不立刻请示还不行，如果不请示就答复，无论是怎样的答复，周恩来都承担不了责任。

而且，工宣队打电话或当面汇报的这个人还很可能是小谢（谢静宜），这个小谢担任毛的机要秘书10多年了，手眼通天，亲密无间，很容易直接见到毛并单独汇报情况。周恩来耽误得起吗？

事急矣，已经火上房！周恩来犹豫再三，只好一反常规地在子夜叫醒毛泽东。

（五）周恩来不打电话，又能怎么样？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

虽然形势紧张，既然毛已经睡了，周恩来不打电话又能怎么样呢？“承担不了的责任”就承担了，又能怎么样呢？，周恩来经过的军国大事多了去了，比这更重大、更紧张的事也多了去了。

凭周的地位与威信，他还是能够承担的。凭毛对周的依赖程度，毛也不至于由此对周怎么样。

所以，周恩来不打电话的可能性也不是绝对不存在。

但是周恩来仍然是打了，这是为什么？

这就要说到周恩来的“机心”。

“机心”这种事，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点到为止。

（六）工宣队为什么要在深夜给周恩来打电话？

那么，工宣队又为什么在深夜1点左右给周恩来打电话或派人当面汇报呢？

这是因为在27日深夜10点——12点之间，蒯大富的团派武装又悍然发动了对清华9003大楼的反攻；不仅重新夺回了已被工宣队占领半天左右的9003大楼，而且又发生了打死、打伤工人的新血案；继傍晚发生的“东区大血案”死了3个人，伤者四、五百后，“9003血案”又死了2个人，又伤了上百人；而且还开了枪，其中一名工人就是被团派黑枪打死的，另有两名工人也是被团派黑枪打伤的。至此，工宣队死亡总数是5人，伤者累计700多了，送伤病员去医院的车都不够用了，北京市的各大医院都住满了工宣队的伤病员。工宣队上下既哀鸿一片，又群情激愤，纷纷要求要拿起武器，甚至动用解放军来消灭“蒯匪”了。

在这般紧迫形势下，工宣队领导层面临巨大的压力，不给中央打电话汇报与请示能行吗？当然不行。

所以，工宣队的这个电话是“必须的”，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也是“必须的”，有了这两个“必须的”，毛泽东的“728 召见”才是“必然的”。

三、这里的逻辑推理掀开了哪些历史暗窗？

将这一系列的时间点连接起来，“727 事件”至“728 召见”的时间曲线就形成了。这条曲线的“数学描述”是光滑的、连续的，虽有拐点，但无断点。

凡是正确而准确、合理而完整的时间曲线，都是史料与常识、逻辑综合的结果。

“数形结合”是数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曲线是函数 $F=f(x)$ 的图象。函数图像用于直观地说明函数性质，是解“函数方程”的必要工具。

在历史事件研究中，时间曲线的形成既是研究的成果，也是继续深入研究的工具，有利于我们精确地阐明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历史意义。

合理的时间曲线一旦形成，需要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维护、维修与微调，并挖掘其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合理的时间曲线本身就能说明许多问题，解决一些问题，还能发现一些被我们一时所忽略的问题。

（一）“728 召见”，蒯大富迟到 3 个多小时的真实原因

众所周知，“728 召见”时蒯大富迟到了 3 个多小时。

几十年来，居然没有人探究他迟到的真实原因。

几十年来，蒯大富在书中及各种访谈中只谈及他撤离清华、打电报，以及在北航被“北航红旗”保卫部长戴维堤通知、派汽车送他赴会的细节，以至于人们全都以为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在撤离、打电报的途中，没有接到通知的缘故。要不是戴维堤先生的据实披露，人们甚至不知道蒯大富还在北航红旗小院睡了一小觉。

但当我们形成了这条“时间曲线”后，盯着这条曲线沉思之时，忽然想起蒯大富迟到的原因绝非他所表达的那样简单。

既然是刘丰打电话通知的韩爱晶，那么刘丰怎么可能不打电话通知蒯大富呢？“728 召见”的直接原因是因蒯大富肇事引起，蒯当然是被召见的最重要角色，刘丰通知的首要对象也必然就是蒯大富。

如果刘丰也是在“大概深夜 2 点钟”打电话到团派总部静斋通知蒯大富，电话这头可能是“无人接听”。因为此时的静斋已经空无一人了。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披露，此时只有在静斋的一个大房间里一把大锁锁着被团派抓来的几十名解放军俘虏，他们被摘掉了领章与帽徽，经过了审问与拷打，被集体捆绑在房间里。他们当然不可能接电话。

刘丰会不会再想其它的办法通知呢？那是一定的。

比如通知工宣队，再由工宣队派出广播车。

既然在北航都响起一片找蒯大富的广播声，清华怎么可能没有同样的广播呢？

是蒯大富没有接到、听到呢？还是听到了通知没有去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委呢？

这都是需要加以探究的问题。

探究的结果，我们不仅证实了推理，发现了实证。

在那个夜里，清华园里确确实实也同样响起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从科学馆撤出的一名 414 战士曹同学当晚睡在主楼，他的回忆中已经提到了这件事。只是大家没有在意。

继而我们又从内部资料得知，当广播声响起时，蒯大富还没有撤离清华。他人在明斋，也可能在新斋附近与几名团派武斗干将任传仲、崔兆喜、周大卫等谈话呢。

这一切都显示蒯大富在撤离前是听到了广播通知的。

既然，蒯大富听到了广播，可是他又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赴会呢？

因为他开了枪，因为他杀伤了太多的工宣队员，他害怕了，做贼心虚了，他以为这个广播是工宣队设局要抓他。于是他在肇事后“闯红灯”逃了。当时又没有“摄像头”。

而当他清晨 6 点左右在北航时，唤醒他的是戴维堤，戴也是他的“哥们”，戴还告诉他韩爱晶已经赴会了，他这才相信了。

这才是蒯大富迟到的唯一真实原因。

（二）“9003 血案”改变了短期的历史。

28 日凌晨，毛泽东已经睡下了。

既然已经睡了（很可能是刚刚睡），表明根本就没有半夜三更再起来开会的打算。

正因为发生了“9003 血案”，才有了工宣队向周恩来的汇报；

正因为有了工宣队的汇报，周恩来才会给毛泽东打电话；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的电话，这才震惊了已经睡下了的毛泽东，毛泽东睡意全消，大为震惊，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正因为毛泽东震惊，才有了“728 召见”。

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9003 血案”就不会有“728 召见”。

当然，类似的“召见”还可能有，可能是 729，730，甚至是八月初的某一天。一旦日期变更了，气氛也就变了。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谁知道变更了日期的“召见”又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所以我们说：“9003 血案”改变了短期的历史。

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分析，详见本书第二篇的有关章节。

四、我将一个巴掌举在这里，等着你来拍！

（一）“立场”与“自信”的唯一性

前 30 年，中国人动辄讲“立场”。

所谓的“立场”有个体立场、家庭立场、单位立场、阶层立场、民族立场、国家立场、阶级立场、社团立场等等。顺过去看，似乎一个更比一个有高度；倒过来看，却是一个比

一个更基本。而且这些“立场”的内涵也是变化的，而这些变化也不一定是“与时俱进”，只能说是“与时俱变”罢了。

但有一个“立场”比所有这些立场更高度，更基本，更永恒，那就是人的立场。始终站在人的立场看问题，这就是“站稳立场”。

上一个世纪，人类社会的伟大发现就是“人权”观念的建立，中国人迟迟疑疑，羞羞答答，最终也在有关公约上签了字。

21 世纪的人类，如果不具备这样一个立场，也就枉为 21 世纪人。

当今社会，“自信”又成为流行语。

“自信”是个好东西，但“自信”也是相对的。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人生而有欲，焉能无过！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过而不自省，其为过也，终为祸乎！如果将“自信”当作一个名词，前面都必须加上“谨慎的”；如果当作一个动词，前面则必须加上“谨慎地”。

是人就会犯错误。有的犯了错误，能自我发现，有的则不能；有的发现了能改正，有的则不能。

有人讲：错误是成长的代价。其实，有的人的有的错误是与“成长”一起成长的。

有人讲：总有一天会从错误中走出来。其实，有的人至死也走不出来，把错误带到了棺材，却将恶果“遗爱”在人间。

（二）对于逻辑推理的“结论”，只能“谨慎地自信”

在历史研究领域，运用推理的方式推导出结论，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一般的论证方式。

这种方式也是我们一再推崇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包括三方面：

① 严格的逻辑。就是我们所说的“致密的逻辑”。

② 深究的精神。就是“掀开历史的暗窗”，“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穷究精神。

③ 优化的精神。就是不仅要正确，而且要准确；不断地用“良币驱逐劣币”的精神。

逻辑推理正确的必要条件是“前提要正确”，然后才是常识与逻辑。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前提要正确、常识要丰富、逻辑要致密”这几项条件都有弹性，都有相对性。

所以，我们推理得出的结论，仍然只能持一种“谨慎的自信”的态度。我们也相信这部文稿里一定有不少错误，只是我们自己目前并不知道它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将这些主观上的、自以为“致密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放在这里的时候，就要有“一颗诚心，两手准备”。

所谓的“两手准备”是指：既等待着你来赞成与附议（包括沉默）；也等待着你来反对与推翻。

你如果要反对它，就要花功夫。你必须要读懂我们的书，指出我们的推理哪些不“致密”，哪些有“破绽”？你“破”了我们的，还要“立”你自己的。你要自己拿得出一套“更致密”的推理。

你如果要推翻它，你就要举得出让大家信服的实证来。

如果你“反对得手”，“推翻得逞”，我们将“乐观其成”，采取真诚欢迎的态度，这也是“必须的”。

研究任何历史事件当然会有“是与非”和“对与错”，这既是目的，也是本旨，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但其目的却不在于证明“我对你错”、“我是你非”，而是为了“用真相淘汰假相”，“让真理战胜谬误”，将“劣币”驱逐出市场。

真诚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具备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何况我们都是 70 上下的人，早已过了“血气方刚”的年龄。我们追求“是非”与“对错”，但不能追求“输与赢”。我们不在乎谁对谁错。如果你能证明“你错我对”，我们共同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颗诚心”。

大海是宽阔的；比大海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人老了，人书俱老，这句话也听老了，但又有几人能做到？就从我们做起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进行的“逻辑推理”仍然是“抛砖引玉”。¹

（三）我将一个巴掌举在这里，等着你来拍！

有人建议：对于“727”中涉及蒯大富及其它当事人的一些“谜”，何不当面问问他们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在考虑。我们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现在不去问，书稿出来后让“书稿”去问也不迟。

因为，有些问题是可问的，有些问题则不可问；有些问题问得清楚，有些问题是问不清楚的；有些问题不去问，他固然是无言，问了仍然是无言。

但研究历史事件是不能搞“无言的结局”。

如果对方回答“是”，这固然证明了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似乎是“皆大欢喜”了，但是在推导结论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及推导过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而我们特别看重的是方法与过程。

如果对方回答“不是”呢，我们能相信吗？如果没有进行更致密的逻辑推理，又没有举出“实证”来，我们怎么可能相信呢？在这种情况下，徒问无益。

所以，经过再三考虑，我们最后决定采用现在的这种方法：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好！现在我就将一个巴掌举在那里，等着你来拍。

而且，我们以“平常心”等待，来也好，不来也好，随缘！

一切的历史，在短暂的喧嚣后，必将归于平静！

平静也有意义，平静之中就有了我们给历史提供的这份备份，等待着下一次的“螺旋形上升”！” ■

¹ 这段话的主要内容在别的章节中用过，正式成稿后将用在这里。

【评论】

浅谈北大武斗所用器具及给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

——《北京大学纪事》正误与补充

樊能廷

《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以下简称《纪事》）是文革后，北大官方动用大力气、大资源，由荣休的校党委书记王学珍、副书记王效挺领衔，花了十年工夫，编纂的北大一百年“官方修史”，很精心、很讲究。笔者节选 1966 年 6 月-1968 年 9 月这部分，4 万 2 千 7 百字，书上几乎一个错误标点都没有。仅见“宫香政”错为“宫政香”，是唯一的文字错误。另外，把昔时的 32 路汽车记为现在的 332 路；把宿舍多少号“斋”记为现在的多少号“楼”，则是口语中随着时间推移的嬗变，不算舛误。

笔者从《纪事》100 年的篇幅中，节选 1966 年 6 月-1968 年 9 月（文革主要阶段）的资料，供研究者使用。对于自己工作的要求是，“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易一字，不错一字”。笔者不把指误、阐发作为节选的任务。比如，该书讲聂元梓去上海“串连、造反”前的事情，真实情况是王力派王广宇从阮铭家把聂元梓接到花园路中央文革记者站住宿。但是《纪事》成书的时候，这些史料还没披露出来，《纪事》记述有误，可以谅解。

如今，笔者读到该书 1980 年 3 月 19 日的记述，引起不少回忆和思考。《纪事》说：

按照 1 月 30 日市委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 年 3 月开始，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 28 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 17、19、20、29、30、32、34、35、36、37、40 楼等 11 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 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 楼等 11 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 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

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家具设备（其中28楼是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的武斗还损坏了在“五四”运动场的20万红机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基础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他们还从建筑材料中用了4吨1/2英寸镀锌管做了长矛。1966年我校有双层木床5300张，到1970年只剩下2300张，损失3000张。估计损坏四屉桌600张，留学生用大衣柜200个，椅子270把，书架250个，大二屉桌240个。还损失毛巾500条，棉衣600件。¹

这一段文字，对于北大武斗的房产部门物质损失，做了数量的统计，本文拟对此相关情况进行一些补充与纠正。

一、长矛、铁棒

长矛是锐器，铁管制成，锋刃是“麻花钢”（建材“螺纹钢”）磨削、焊接在杆上。矛杆约1米6，锋刃约0.3米。校文革掌权两年多，有金属材料库，有工厂、有工人，这两种材料他们都有，制造了大批的长矛。1968年3月39日凌晨1点，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两派混住的31斋学生宿舍，公社武斗队所持的“兵器”就是长矛。《纪事》所述“镀锌”二字不确。现场看到的和缴获的长矛^[2]，是管壁涂有桔红色防锈漆的铁管制成的。工宣队进校后，新北大公社上缴武器，930支长矛，涂有桔红色防锈漆，还上缴200根铁棒。《纪事》所述“1/2英寸”完全正确，这种管径（因为1英寸是8分），口语中称为“四分管”。居民家用水管、暖气管多为“四分管”或“六分管”。“四分管”内径15毫米、外径21.3毫米，重量1.25公斤/米。4吨“四分管”总长度3200米，不计算锯缝和“料头子”的损失，可以制造2000支长矛。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和“监管人员”，既用长矛，也用铁棒^[3]，那么，

¹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969页，2008年4月第二版。另，此书1967年3月有误，应为1968年3月。

耗用的钢管，数量大体上与《纪事》碰得上。以上说的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方面的长矛。

新北大公社拥有大批长矛、铁棒，不是用来锻炼身体的，而是用作弹压、残害“阶级敌人”的。“老佛爷”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可以扩大到任何不同意见者的头上——长矛、铁棒，一方面用来对付“井冈山兵团”；另一方面也用来对付“黑帮”、“牛鬼蛇神”等“专政对象”。郝斌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读过语录以后，监管学生或给我们派活儿，或宣布事项，有时候也会喊出某人给一顿拳脚。晚点名，才是我们人人都提心吊胆的一场，长达四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每次都要喊几个人站出队列，轻则训斥辱骂，什么叫师道，什么叫人格，那就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重则是拳脚之外另加棍棒。有一阵子，武斗用的长矛也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个个低头弯腰，但见长矛在眼前晃动，不敢抬头去看拿着这种‘傢伙’的人。我们已经是毫无抵抗力的一群，有几条木棒足以震慑，还犯得着用这种东西来对付我们吗？倒是另一种短兵器，让我们更怕：那是一米左右的自来水管，一头磨尖，可作为利器；另一头套有胶套，便于手握，也可作为钝器。商鸿逵先生有一次‘语录’背得不利索，越背越乱，又分辩了两句，就被这个‘傢伙’当头一下。当时我和商先生各站队伍的一端，隔有七、八米远，‘噹’的一声，能听出那是铁管敲在脑壳上发出来的声响。”¹“这个时候正值酷暑，劳动量大增，新‘规矩’不断。我们被告知，熄灯之后、起床之前，监管人员要巡逻查夜。凡起夜上厕所的，见到监管巡逻者，要先行立定，再喊：‘报告——我是反革命分子×××，要去厕所。’得到准许，才能移步前行。否则——监管学生把手里的长矛高高举起——‘老子的这个家伙是不吃素的！’”²

后人须知，“老佛爷”是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对于聂元梓的共称，“红太阳”在公开场合，口头上也“亦庄亦谐”，称呼聂元梓为“老佛爷”。

据笔者所知，“井冈山兵团”方面，在1968年3月29日凌晨1点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偷袭31斋学生宿舍的时候，一支长矛也没有；赤手空拳、无法自卫，上百人被刺伤、打伤、

¹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第124页，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

² 同上，第128页。

跳楼摔伤。31 斋逃亡的学生和其他宿舍楼被驱赶的学生，进入 32 斋和 37 斋，有样学样，开始制作长矛。材料从哪儿来？就是停止供暖的暖气管——用手工钢锯截断暖气管，也焊上锋刃。1968 年 3 月 29 日之前，“井冈山兵团”没有独占的楼宇，28 斋是空闲的越南留学生宿舍楼，“井冈山兵团总部”占用 4 间屋子、广播台占用 4 间屋子，整幢楼是不分派别、混合居住的。3 月 29 日中午，“井冈山兵团”海燕战斗队的青年工人，清理住户，把不相干的人“礼送”出楼。于是，“井冈山兵团”独占了一座楼。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一台电焊机，安放在 28 斋楼内，开始焊接、制作长矛，“焊工小作坊”一时供不应求。制造出第一支长矛的时候，大家高兴莫名，好像生命安全有了保障了。

关于 329 事件，俞小平说：“对着我们冲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武器、装备、组织到后勤，都占了巨大的优势，一个强势的当权派向一个弱势的在野派发动突然袭击的优势。其后几天，一个老井给我看了他们从公社派那里缴获的一支长矛。那长矛外面是橙红色涂层，显然是用无缝钢管原材料截取的，长约 1.9 米，直径约 2 厘米多，顶端焊有一段约 25 厘米长 1 厘米多粗的钢筋，钢筋顶端用砂轮磨得尖锐锋利无比，闪烁着冷酷无情的钢铁光泽。”俞小平还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当权派，有权、有钱、有物资、有住房、有食堂，卡住部分教职员工的工资、学生的助学金不发，给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成建制地发放棉军衣、柳条帽、长矛，后来更以昂贵的金属板材成批切取护胸甲，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他们都有了。井冈山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无奈之下，只能锯下楼内的暖气管做长矛，模仿新北大公社，也在暖气管上焊上钢尖，头戴规格不一、各处收集来的柳条帽，身披材料不同的护胸甲，披挂上阵，面对不时冲击而来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¹

却说长矛的嬗变，源自实战。武术行里讲究“一寸长、一分强，一寸短、一分险”。临阵长矛对刺，还真是谁手中的兵器长，谁感觉安全、放心落胆。“井冈山兵团”本来就没有“制式”长矛的供应，自由散漫，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制作长矛，上阵的时候七长八短，被笑作“丐帮”。笔者见过的长矛，有不足 2 米长的，有 2 米半长的；还有干脆使用（玻璃

¹ 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丛璋等人主编《燕园风云录·四》第 80 页，2016 年 8 月。

钢)撑杆跳器械或使用长竹竿的。

原新北大公社成员王复兴有如下记述:“3月20日左右的一天傍晚,晚饭后我从大饭厅往南校门由北向南的路上散步,突然听到身后有紧凑的脚步声,回头一望,有两个手拿长矛、戴柳条帽的人在后面10米远正加紧脚步追我。我感到不妙,撒腿就跑。两人立马紧跑追我,我突然感到后背如针刺一般被刺了一下,赶紧左拐跑进27楼,那两个人这才停止追逐。我跑到黄虹坚宿舍,述说了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在她那儿躲了半个小时。而后跑回38楼宿舍,王渊涛、陈双基正好在,我脱下外套秋衣,让他们看我后背怎么了。他们告诉我,在我后背脊椎(后胸)的正中部位,有个小红点,皮肤被刺破了一点点。”¹

1968年3月20号,校文革成立了武斗指挥部,新北大公社有“第二期学习班”编练的专业武斗队(钢一连最著名)、有长矛和柳条帽。彼时,“井冈山兵团”一支长矛也没有,一顶柳条帽也没有——不言自明,王复兴受到“有个小红点”惊吓,如果不是编造的虚妄故事,那,绝非手无寸铁的“井冈山兵团”所为。联想到329事件,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动武斗,突袭夜阑人静的31斋,他们的第一个伤员,竟然是被“自己人”铁棒打破脑袋、长矛刺伤后背的化学系62级赤手空拳学生田建行!说起来,够讽刺的。

“老佛爷”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动武斗,实在是饮鸩止渴、作法自毙。

二、大弹弓、礮石

北大“武装割据”时期,“井冈山兵团”占据学生宿舍毗邻的28、30、32、35、36、37六座楼,被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楼群团团围困。处于包围圈的内线,这六座楼门窗、屋瓦、墙面的损坏,都是外线包围者、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大弹弓轰击的。

双方都有大弹弓。占据楼宇多的一方,射击口多,自然而然,弹弓就多。大弹弓的皮筋,是自行车内胎,或者是乳胶管(各四股、共为八股),一个壮汉气力不足以开满弓。

¹ 王复兴:《抢救记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9月,144页。

皮兜是排球壳子剪开、制成。消耗品弹丸，是卵石或者破碎的红砖。

红砖双方都有，而卵石是新北大公社独家秘器。井冈山兵团被团团围困在六座楼里面，人员进出不得，没有卵石的来源。校文革有车队，公然一卡车、一卡车地从郊区河滩往学



暖气片作“礮石”

校运卵石。卡车司机如今还健在，不难问到当初装运卵石的情况。

还有损招——全校几百名“黑帮”、“牛鬼蛇神”都在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管制、残害之下——可以强迫“黑帮”、“牛鬼蛇神”为他们装运卵石，或者直接强迫“黑帮”、“牛鬼蛇神”往学校肩背力扛卵石。郝斌有这样的记述：“‘牛棚’里的监管人员可以随意处置任何一个人，这是一种常规；可某个监管学生常常格外眷顾某个‘黑帮’，又成另一种‘常规’。这个聂玉海，可以说是周一良的对头冤家——‘单向的’对头冤家。一九六八年夏天，关在太平庄的‘牛鬼蛇神’一个一个被拉回北大，单独批斗，监管学生把这叫做‘单兵教练’。周一良先生是早早被拉回去的一个。押解他的，就是这个聂某人。出了太平庄，就是那段河滩路。聂玉海捡起鹅卵石，装进周先生的背包，一块又一块，直到装满，让周先生背到北大。当时校内分成两派，武斗正酣，这些石头放到用自行车内胎做成的强力弹弓上，正好做子弹。从太平庄到北大，走路、坐车近三个小时，步行的路程大约十公里。五十五岁的周先生背着这包石头不堪其苦，聂玉海则以此为乐。”¹

大弹弓的威力，煞是了得：笔者知道“井冈山兵团”这边被弹弓打掉牙齿的、打开头颅的、打瞎眼睛、打断胳膊腿的，不下10人。技术物理系63级学生陶令煌，前额打破，一辈子留下大疤，像是三只眼。化学系62级学生张曼平，几乎打掉半数牙齿，才二十多岁，不得不装上满口假牙。透窗射入28斋的卵石，在水泥地板上弹起，打断了青年工人小李的胫骨（北京土话叫“迎面骨”），在北医三院住了四十天以后才伤愈。

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双方上缴武斗工具，“井冈山兵团”上缴了8副大

¹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126页，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

弹弓（即使想藏也无处可藏）。而新北大公社在武斗四个月期间，动用20万红砖加上若干卡车的卵石，用大弹弓射击过数十吨弹丸、礮石，“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打烂井冈山楼那么多门窗、屋顶、墙面、双层床的“砦栅”，最后，一副弹弓也没上缴。

三、地道、天桥

前面说到，“井冈山兵团”六座楼偏居一隅，被新北大公社团团围住。“割据时期”开



阅墙怎忍刀兵见，何故空中徒杠桥。
逼我途穷临绝境，胸膺尚有路条条。

初，“井冈山兵团”楼和楼之间通道，用学生宿舍的上下双层木板床，在地面上竖立起来，用粗铁丝绞连，作为防御弹弓轰击的“砦栅”。但还是不安全，又向通道上面加设顶子——当然，也是木板床。不想，没几天，对方的大弹弓就把“砦栅”轰炸得千疮百孔、七零八落，甚至床腿都打断！前

面提到的陶令煌，就是在通道“砦栅”里被礮石击中前额，成为三只眼的“二郎神”。抵御大弹弓，“砦栅”也不够安全。

路还是要走呀，怎么办？就有“现代愚公”想出挖地道的主意。看电影“地道战”或参观“焦庄户地道”可能觉得挺有趣、神得很。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地道在地面以下，它是固定的，不能移动，完全是防御型设施。坦克车才是进攻型的。

《纪事》说聂元梓、孙蓬一挖了地道，不对。太平天国“天京”被围，“长毛”城防坚固，曾国荃挖地道，地道作业加上巨量炸药，轰塌城墙，攻进“天京”，纵兵烧杀奸淫大掠。1968年329事件，新北大公社夜袭攻占31斋，古今一体，也是纵兵大掠。31斋是男生宿舍楼，算是聂孙心目中的战略要冲，必欲夺之而后快。井冈山男生都逃命去了，攻占31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勇士们尽情劫掠，不负此夜力战之劳。

聂元梓、孙蓬一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尽占武力优势，士气旺盛，大力实施“武统燕园天下”，聂孙怎么会挖地道呢？地道的事情，《纪事》的记述，张冠李戴了。

《纪事》说的几条地道，都是“井冈山兵团”割据区的楼与楼之间交通孔道。《纪事》说的地道尺寸规制符合实际。记得我们化学系62级同学耿天彭有诗句“地道行军戈相拨”，就是说地道里两个人对面行走，要“相拨”一下。见到有网络文字说，“井冈山兵团”地道里边没有照明设施，靠蜡烛照亮儿，非也。有拉线照明，是最简陋的白炽灯泡，地道里，摸黑是走不了路的。

“井冈山兵团”挖地道，纯属迫不得已——地面通道“砦栅”不能保障行人安全，只好转入地下。何况，挖地道是一桩苦活儿，笔者略有体会。挖地道是轮班作业，地下的原始黄土层，细细的，不含砂砾，潮而不粘，刨挖并不很费劲。每个人干不了很大工夫，因为没有换气通风，地下十分憋闷湿热。37-36斋地道将近挖通的时候，笔者当班掘进。技术物理系62级女生傅华下来“视察”，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就是缺空气的缘故。她走不大工夫，笔者清楚地听见对面刨土的声音，心想，再坚持一会儿，多挖几铁锹……。忽然，通了，碗口大一个洞，迎面的凉风呼呼地冲过来，痛快透了——可以大口地呼吸清凉的空气了。这是第一条地道挖通的情形。

地道的最后命运，是自行坍塌。挖地道的时候，没有加设坑木支撑，只是用铁锹把地道顶部剜成半圆形的拱券。地下土壤本来就有潮气，工宣队进校，季节入秋，雨水频仍，首先是32斋至35斋之间的地道，自行塌方，地面凹陷1米多。好在地下除了照明线和灯泡，别的什么也没有，塌方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事故。

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窘境的“井冈山兵团”，在28斋和30斋之间，架设了“过楼天桥”，在当年，大概算得上北京的“首创”。笔者推想，28斋和30斋之间的沥青路面走汽车、承重，不敢挖地道从地下穿过沥青路，怕塌陷，故而架设天桥代替地道。

28斋和31斋外形一样，两座楼好像是一张图纸下来的，都是南北70余米的主体，两端各加30余米的短横。天桥是从28斋的工字型楼南短横的西端面，接到东西走向、一字型30斋的东端面，悬空担在两楼4层的水泥地面上。至于天桥的建设，笔者住在37斋，竟然一无所知，而且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天桥。后来笔者步测，28斋南横楼西墙，到30斋东

墙，22步。就是说，天桥空中跨度15米有零，离开地面的高度将近10米。俞小平说：“我曾天桥上多次穿行于28楼和30楼。有人很狡猾地（在天桥护栏上）贴了伟大领袖像，新北大公社不敢用弹弓打天桥上的行人，害怕犯下攻击毛主席像的“罪行”。¹

近年，笔者见到同学发表这张图片和建造天桥的详明经过，不由小诗一叹。架设天桥用的木料，的确确是来自《纪事》所说“35、36楼的屋架风撑”。

四、棉衣、毛巾

《纪事》说“损失毛巾500条，棉衣600件。”这个账简单明了，直接算在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头上就是。329事件中，笔者目睹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着装——黄色军棉袄、左臂扎白毛巾。4个月的武斗期间（3月29日到7月28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制式”黄色军棉袄没变。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紧锣密鼓进行，笔者被押解、提着马扎，到学三食堂，“参加”过一次化学系批斗“反革命分子”齐菊生的全系大会。阵阵轰雷般的口号声中，凶残地扭齐菊生胳膊、揪齐菊生头发、踢他膝弯迫其下跪、跳起来打他脑袋的同班同学蒋其宝、倪永康，还穿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制式”黄色军棉袄。

1968年还是“票证供应”年代，北京居民每人每年发给十六尺布票，搭上棉花票，可以购置或者制作一件棉衣。新北大公社成员参加武斗队，马上得到“里外三新”的黄色军棉袄，不无小补，至于是不是被旁人讥讽为“黄马褂”，那就顾不得了。

本文引用《纪事》中的这段文字，只记述了北大武斗中的物质损失。更大的损失还有无辜逝者——殷文杰、温家驹、刘玮的生命，还有数百名受伤者，以及留存两派群众心灵的创伤。时间过了半个世纪，这些创伤还没有抚平。武斗的发动者对这些事实，仍在掩耳盗铃，甚至企图把责任推到他人头上，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反思。■

¹ 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丛璋等人主编《燕园风云录·四》，第86页，2016年8月。

【述 往】

按：清华文革初期阶段，以蒯大富为首的极少数极端分子在清华大学制造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及“12 人反党集团”两起大型冤案，秘密逮捕了十余名无辜群众与普通干部，将他们关押在化学馆、生物馆、三堡及 200 号等处，长期关押，私设公堂，非法审讯，酷刑逼供，致使死伤多人，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迄今为止，清华很少有人对此作过系统研究，我们所收集到的情况也既不全面，也不系统。目前，我们仅收集到谢引麟同学的一篇回忆文章，并在征得她的同意后与我们所著的《清华 727》系列文章一并发表。

——胡鹏池 但 荣 2016-9-19

我在清华“古拉格”92 天

谢引麟



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提文革史，一提就恼羞成怒，好象有人挖了他的祖坟。正如古语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作为文革的受害人之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更有权力将这段历史写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文革苦难，决不容许文革式（左图：谢引麟学友近照）的灾难再重演。

—

1968 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三年了。全国范围内文攻武斗，腥风血雨。清华园内，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团派与清华井冈山 414 派，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展开了殊死搏斗，校园内再也听不到歌声和读书声。

我原住在文艺社团，担任一些团部工作。文革开始后，文艺社团很快就不复存在了，我便回到班上（冶金系铸七班）。大约在 1967 年秋，经同班同学黄安妮介绍，我开始与她一起参加“巴黎公社”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与文革中的任何小组一样都会不定期地讨论文化革命的形势。大家基本上支持温和派 414 派的看法，主张大部分和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反对团派“彻底砸烂旧清华”的观点。当时的校园内，许多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很有看法，组内有的人把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但我却没有参与写大字报。

1968 年年初，团四斗争更加白热化了。团派扬言要抓 414 内“一小撮反革命”，他们先是捏造罪名，抓了所谓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意犹未尽，又抓了数力系力 603 班的学生邢竞侯和校团委干部 XXX 老师。

鉴于武斗升级，宿舍已没法住了，许多同学先后离开了清华园。我和黄安妮反对武斗，当然也不会参加，但我家在上海，黄安妮家在湛江，都那么遥远，不是想回家抬腿就能走的。可是不回家，又到哪儿去安身啊？这时候，我们班原来的辅导员张琴心（冶金系铸六班）来清华找我们。她分配的工作单位在山西太原，因太原武斗，又回学校来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商量借住到荷花池第二宿舍的沈老师家里（沈夫妇搬到别处住了），并购买了北京市的汽车月票，计划到工厂去参加义务劳动，在这个越来越无意义的文革中找些有意义的事情做做。

大概在 5 月初，我们发现我们住的房间的玻璃窗被打碎，我从朋友处借来的自行车前叉轴被锯坏。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团派针对我们的有计划的骚扰。不少熟人都劝我们快点离开清华，但是能去哪里呢？到处都在武斗，到处都不安生，家又那么远，没有办法，只得无奈地暂时在荷花池第二宿舍住下去。

真正出事是在 5 月 8 日那一天。那天下午，张琴心去七公寓串门，临走时她说可能晚上不回来睡觉了。晚十点左右，我和黄安妮躺在床上，准备入睡了。突然，砰地一声巨响，我们的房门被撞开了。四、五个彪形大汉一下子就闯入我们屋内，冲到我们的床头，其中

一人厉声喝道：“谁叫黄安妮？谁叫谢引麟？”

对于夜半三更、突然破门闯入的这一群凶煞般的男人，我和黄安妮的心中都非常害怕，但是更多的是气愤，我们感到这批人简直就是一伙强盗，他们夜深人静私闯女生宿舍，是一种流氓行为。

于是，我们坐起身来，冷静地质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

他们其中一人厉声喝道：“不许说话！谁要嚷嚷，小心脑袋！”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再说话，他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就把我和黄安妮捆上双手，蒙上眼睛，然后用一床被子一卷，就把我们扛走了。我和黄安妮就这样被这批匪徒绑架了。

我被带到了一间大房间里（到第二天我才认出这是生物馆三楼），但我不知黄安妮被带到哪儿去了？

不久，进来几个人，他们凶巴巴地盘问，叫什么名？哪个班的？

我一听，很生气，反问他们：“你们把我抓来了，你们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嘛？不知道我是哪个班的？你们这样随便抓人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

其中一个人一听我这么说，马上吼叫：“你还嘴硬，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还这么狂！”

接着，又进来一群人，问我张琴心在哪里？

我回答：“不知道。”

一个穿黄军装的矮个子，立即逼近我，抄起他的大巴掌连续左右开弓地抽我的耳光，他一边打，一边吼：“你说不说，说不说？反革命分子还想包庇反革命分子？”

这是1968年5月8日的夜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而且挨打得是那么凶狠，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出生于一个上海的普通职员家庭，家境虽说一般般，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得到的都是爱，从来就没有人打过我，甚至都没有被人骂过。今天，一个接一个的耳光，抽打在我的脸上，身上、心上满是痛。我感到屈辱，我感到愤怒，满腔的怒火在我胸中燃烧，我瞪大着眼睛，咬着牙盯着他们看，一言不发。

他见我仍不答，就更凶狠地打我耳光，我被打得眼冒金星，头晕目眩。他再用脚绊我的腿，我立刻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马上就有几个人蜂拥而上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拳头如雨点般同时向我击来。

又走进来一个大个子，嘴上叼着一根香烟，面带一脸奸笑地要我坐下。我不明白他笑什么？他怎么能够笑？望着他那张奸笑的脸，我感到恐惧，全身发冷，不由得打寒颤。这个大个子皮笑肉不笑地继续向我盘问张琴心的去向。我望着他那张假惺惺的笑脸，心里明白，这些人全是一伙的，我要识破他们软硬兼施的鬼把戏。

我冷静地一想，张琴心一旦返回寂静的荷花池第二宿舍，肯定也会落入他们的魔爪，还不如告诉他们张琴心在七公寓，那儿人多，可能会有人营救。我当时认为老四的人不知道我们被抓走了，绝大多数老团的人也可能不知道我们被抓走了，只不过是这几个老团的坏蛋绑架了我们，一旦广大革命群众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就会被放出去了。

我多么盼望能有人来救我们啊！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是天天盼、日日盼，盼我们的救星毛主席，盼亲人解放军，盼我们的414战友，盼团派的善良的群众，盼有人来将我们救出火坑、跳出魔窟。这一盼盼了整整三个月。

后来得知，张琴心也被这同一群暴徒抓了。但她不是在七公寓被抓的，而是在她返回荷花池第二宿舍时，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老团绑架走了。这之后我再没见过她，直到八月八日被解救的那一天。

我不记得在5月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这群暴徒对我拷问了多少时间？拷问结束后，我被他们带入生物馆的另一个房间。我记得那间房内的地上有一块木板，木板上面铺一块草垫，一个流里流气的男看守不停地在我周围转来转去，吓得我一夜无眠。

二

第二天，5月9日上午，我又被转移到一间漆黑的小房内，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

子和一盏灯。我开始考虑逃走，但是我逃不了，门被反锁着，外面一直有看守巡逻。我的耳边只听到修筑工事的叮当声，砂轮的飞转声，马达的轰鸣声和审讯“犯人”的怒吼声。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怎么会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反革命”？我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团派同学搞错了，我鼓励自己，不要气馁，一定要据理力争。于是，我再次向他们提出抗议，指出他们这样随便抓人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当然，我做的这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

下午，进来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他要我交待“十二人小组”的罪行。

什么“十二人小组”？我楞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那男人阴笑道：“你装什么蒜？十二人小组，陈伯达专案组，你还会不知道？”

经他这么一说，我似乎想起了什么。前一阵，听说邢竞侯和 XXX 老师被老团抓走了。不久又传出，邢的罪名是跟踪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整陈伯达黑材料，XXX 是陈伯达专案组副组长等。可是谁会相信这些话呢？难道谣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事实？（我是通过我的同学黄安妮认识邢竞侯和 XXX 的，据黄安妮回忆她是在 67 年 7 月武汉串联时认识 XXX 的，可能也在那里认识了邢竞侯。）直到这时，我还幼稚地以为团派抓我们只是派性作怪，还幻想着他们会很快承认错抓了我们，于是耐心地向他解释：“根本不存在什么十二人小组，更谈不上陈伯达专案组，只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谈谈时事，关心文革运动而已。”他当然听不进我的解释，所有的解释都徒劳。

当晚，我又被蒙上眼，五花大绑地转押到 2 号楼东头的另一个房间。从这天起，他们开始对我正式审讯了。审讯的人三班倒，轮番干，逼我交待所谓的“十二人小组”罪行。

“十二人小组”本是他们强加的，子虚乌有；我拒绝交待，当即毫不畏惧地写下了保证书，保证没有什么“十二人小组”。

他们见到我写的保证书，冷笑道：“你写吧，将来要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接着，他们对我大谈 XXX 是如何如何地反动，并说卫戍区早就点名要他了，是他们不肯给；又说他们已经掌握了我和 XXX 关系是如何地密切；还说“十二人小组”的案已经定

死了，这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当时我并未识破他们的险恶用心，还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所设的一个圈套。我想一个人应该襟怀坦白地做人，于是就向他们承认了我议论过陈伯达。我理直气壮地说：“如果说要上纲的话，那就只能在这个问题上上上纲，别的没有了。如果你们认为对陈伯达有看法就是反革命，那你们就送我去公安局。”

在车轮般的审讯中，他们继续逼我承认“十二人小组”是一个反党集团，还说，十二人小组成员有张雪梅，楼叙真等。我说：“首先这十二人小组就是不存在的。虽说我知道张雪梅是 414 的总部委员，但我不记得认识她；楼叙真是我在文艺社团认识的，文革开始后，从未碰过面；我仅参加过几次“巴黎公社”的小组活动，从未听说过十二人小组。”

我又说：“反党集团应该有纲领、有组织、有目的，而我们只是一些学生随便凑在一起聊聊文化革命运动，怎么谈得上是反党集团呢？”

他们说：“你们组 XXX 就怀疑陈伯达，说陈伯达会犯错误，这不是你们组的思想？”

他们问：“你们说陈伯达在中央作检查了，还有谁在中央作检查了？”

我说：“陈伯达在中央作检查的这条小道消息是从团派那里传来的，其他情况我根本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人家早就交待了。”他们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翻着 XXX 的交待材料。

有一次，他们干脆把 XXX 的交待材料故意留下了。我趁看守不注意时翻了一下，上面有上纲很高的言论。然后，他们又给我看“罗文李饶”的认罪书和听他们的认罪录音。

我当时想，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他们的事情我不了解，他们要认罪，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毫无关系。我了解我自己，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我没有罪就是没有罪，我就决不能认罪。

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整夜不让我睡觉，轮番拷问审讯，拿着 XXX 的交待材料逼我交待所谓的“十二人反党集团”怎么议论“武汉七二零事件”，怎么议论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议论杨成武，议论接班人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因此我如实回答没有这

些事。他们就说我不老实，要我交待、揭发，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又怎么交待、揭发呢？

大概是 5 月下旬，我又被转移到 200 号（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继续逼我交待上述问题。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我没什么可交待的。于是，他们就残酷地折磨我。他们先是令我罚站，必须立正姿势，不能稍息，不能弯腰。我经常连续站几十个小时，站得两腿发麻、肿胀。有一次我觉得受不了了，于是稍为走动了一下。一名看守发现后，他马上叫来一个彪形大汉打手。这家伙嘴上叼着香烟，手持大棍，就往我的身上、手上猛打，还抽我的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

他一边还威胁道：“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吃素的，你是嫌这么站着太舒服了？那我先给你尝点滋味。告诉你，这回我拿这根棒子，下回就该拿那根粗的了。”

就是这个凶恶的打手，经常用拳头打我的乳房，用腿踢我的下身。这个暴徒还把我当成靶子，挥动着他的手臂，然后憋足了劲把垒球朝着我身上扔。更可恶的是，他多次把我逼到墙角，然后，在墙角把我往死里打。他满脸横肉，三角眼瞪得铜铃一样大，黑眼珠子闪着凶光，一步步地逼近我，长时间地恐吓我。我象一只在恶狼面前无助的小羊羔，哆哆嗦嗦地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墙角，再也无路可退了，只好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几次我感到他的鼻子几乎要碰到我的脸；接着就是例行的拳打脚踢。

我那时还是一个花朵般的年轻女大学生，从小在父母呵护下长大，20 多岁做梦的年华，渴望着幸福渴望着爱，现在却在首都的高等学府被一群暴徒关在黑屋子里遭受百般侮辱与毒打。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众多的至爱亲朋，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我因何消失了；而我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我真没想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竟有这种法西斯恐怖；在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下竟有这样的黑屋子！

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痛苦和屈辱把我的心都撕成了碎片。

这样的折磨几乎天天有，有时几个打手同时来，一个打手在拷打我，另几个打手就站

在旁边欣赏，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冷冷发笑。

这些人中还有女生，张 XX 和马 X。张 XX 表面看是做记录的，实际上她是打手们的帮凶，有时候她也亲自操起棍子拷打我。马 X 是文艺社团合唱队的，我们曾同住在 4 号楼，我对她原有的印象也不错，想不到原来貌似温柔的她，现在判若两人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工物系的王子 X 是这群打手之一。

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我们清华大学生，原来也是很单纯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将他们变成了这样毫无人性的禽兽？为什么这些人在看到别人挨打时，望着那么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场面，没有表现出丝毫同情心，他们怎么能看得下去？又怎么能笑得出来？

他们继续逼我交待反革命罪行，每天我的心如刀割。我总不能编造谎言啊！没什么可交待，他们就拿别人的所谓交待材料逼我承认，我不承认就是包庇反革命，死路一条。

我已经不再把审讯我的人看作是有理性的人类了，我已经失去了和这批禽兽据理力争的信念，对他们诱导式的审讯只回答说：“也许吧，可能吧！”

但是，这样的回答使我的内心十分痛苦，也非常气愤。因此我又收回这些“也许”与“可能”。他们马上就使出更毒的一手，反咬我一口，说我是现行反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上加罪，罪加一等。然后又调来几个彪形打手对我更残酷地严刑逼供，轮番抽我耳光，打得我鼻子、嘴里鲜血直流，牙齿肿痛，两耳轰鸣，两眼直冒金星。他们强迫我趴在地上，四肢着地，逼我承认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我不承认，他们便拷打了我一整夜。

这种骇人听闻、毫无人性的逼供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没日没夜地进行着。后来，他们又规定我的回答中不能出现“可能”与“也许”，一旦说了，耳光马上打过来。他们把我推到墙边，强迫我全身紧贴着墙壁站着，规定我的头、后背和脚后跟必须同时靠墙，然后命令我往地下蹲。这是一个连体操运动员也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动作，当我试图蹲下去时，立刻就失去了平衡，一头就栽倒在地上，使我整个人趴在地上；他们又强迫我立刻站起来，我刚刚站起来，他们又要我紧靠墙壁站好，然后，又强迫我后背和脚后跟紧贴着墙壁往地下蹲。就这样，他们强迫我再站起来，再蹲下去，我经常连续栽倒在地数百次之多，摔得

我全身虚汗淋漓，筋疲力尽，连支撑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连续的体罚，使我月经不断，小肚子疼痛难忍，向他们要药，他们骂我装病。

几天后，他们又想出一个新题目，逼我交待在学习“联共党史”时的炮打毛的言行。

我说：“学习‘联共党史’是为了提高路线觉悟，我们班上组织学习过，怎么也有罪呢？”

“你们是反革命学习，联共党史是赫鲁晓夫写的”。这帮家伙说。

见我不按他们说的交待，就不让我睡觉。我连续站了五天五夜，站得两腿肿胀，实在挺不住了，晕倒在地上。看守发现后冲进来一边骂，一边拖我起来：“不交待，就这么站着！”

他们用棍子狠狠地砸我的肩，砸得我双肩由红肿到血肉模糊，一碰就是锥心刺骨的疼。还用铁棍朝我身上乱打，用鞭子没头没脑地抽我，致使我全身上下都是一条条紫血痕，疼得我全身不能动弹，连上厕所都蹲不下了。他们又逼我趴在地上，两手两腿伸直，用鞭子抽打，逼我承认：“XXX 说，学习联共党史要结合文化大革命，重点学习斯大林时代大清洗。”我不承认，就骂我“死顽固！”

接着，又逼我交待炮打毛的言论，“九大”的问题，胡说我们讨论了有关“九大”的人事安排等。

每出一个新题目，我就会被毒打一頓。我不承认，不交待，就又不让我睡觉，又连续站了几天几夜，站得我神志昏迷，失去知觉，摔倒在地，额头撞出了血；我站得精神失控，在屋里乱走，直到头撞到墙才惊醒；站得整个小腿一般粗，脚面肿得无法穿鞋，只能光脚站着。几个打手睡够吃饱了，就悠闲地站在一边看着我，说说笑笑，把虐待象我这样一个孤苦无助的年轻女孩当消遣；看到我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上，他们笑得特别开心，逼着我站起来，又看着我摔下去，又逼我站起来，冷不丁地在中间往我身上打一拳，踢一脚。这些人还有一丝丝的人性吗？他们只有兽性，所作所为与日本鬼子和德国法西斯有什么不同！

大概是 6 月中下旬，他们又出新花招，逼我交待一个在科学馆开的黑透黑透的黑会，

并说：“在这个黑会上，你们是多么地得意啊，好像天下都是你们的了。”我答：“我没有参加过这种会，不可能的！”他们说：“不可能？哼，等着瞧吧，这个问题先留着，以后交待！”然后，逼我交待反毛泽东的言论，强迫我学习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语录。更恶毒的是用语录向我栽赃。

有一条语录，意思是，国民党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马上问：“你们要推翻什么？！”

“我们不想推翻什么。”我答。

他们立即恶狠狠地说：“你敢把‘推翻’这词滑过去？交待！你们要推翻什么？！”

他们又强迫我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问我：“你要走什么路？是要走活路，还是要走死路？”

我说：“走活路。”

他们说：“那好，走活路，你就要交待反毛主席的言论。”

我说：“走死路。”

他们说：“走死路，你就是坚持反毛主席。”

他们用棍子拼命砸我的肩，打我的腰部、腿部，朝我身上乱打，打够了，再问我走什么路？

我只好说：“不知道走什么路。”

我想我决不能把莫须有的罪名往自己身上加，也决不能把莫须有的罪名往别人身上加。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要经受得住什么共产党员的考验，我只是想我不能那样做。

我想进监狱，我想监狱里一定比这里好。为了尽快离开这里，让真正的司法机关来审理我的言行，我就摆出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议论过陈伯达。

但这无济于事，他们说：“你只交待了全部罪行的百分之一，还有一整套、一整套反动观点没有交待。”

我却又说：“就算这样，这百分之一也是无中生有，是你们逼我说的。”

对此，他们竟然说：“你的问题不是编造，而是交待不交待，我们不怕你编造。”

我坚持不按他们说的交待，他们便罚我站着，不让睡觉，一旦看守发现我闭眼站着，会马上拿棍子拷打我全身，还强迫我抽自己耳光。

每次上厕所，均有看守押送。有一次去厕所的途中偶然碰到同时被抓的黄安妮，这才知道她也关在这座楼里。于是，我写了一张小纸条，丢入手纸篓内，简单讲了我每天受酷刑、逼交待黑会等的苦状，希望她能看见。下一次上厕所时，我在手纸篓内发现了她的回复纸团。打开一看，嚇一跳，黄安妮在纸上所写的所谓黑会内容和打手逼我交待的几乎完全一样。原来，他们也是这样逼她的。我这才恍然大悟，彻底弄清了这伙人就是要凭空将反党，反毛，反文革的罪名强扣在我们头上，凭空捏造出一个所谓的“黑会”来，凭空制造出一个“十二人反党集团”来，从而将这个屎盆子扣在 414 头上。

第二天，他们又来逼我交待那个黑会，我便把那张纸条给了他们。我对他们说：这些所谓的黑会内容都是他们编造和逼供出来的。并再一次重申：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巴黎公社”的成员讲过这些出格的言论，也没有参加过这些所谓的黑会。从日期上看，那天我没有在学校，你们可以去调查。

他们听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一边用棍子砸我的肩，一边吼着：“你敢说没参加这个黑会？赶快交待！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这些话肯定是你讲过的，你在黑会上的言论比这个恶毒得多！那天你穿什么衣服，坐在谁边上，别人都交待了，你再也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那段时间我根本就不在学校，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坚持道。

于是，两个审讯者，一个用木棍砸我的肩，一个持铁棍打我身体，打得我前仰后倒，摔倒在地。

打手们一边还不断地吼着：“有没有？有没有？”

我仍答“没有。”

他们便更凶狠地抽打我，还说：“你这个反革命分子竟敢向我们提要求！我们井冈山

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不用调查，人证、物证俱在，连‘罗文李饶’都证明你参加了，现在是看你交待不交待？！”

“没有！”我坚持道。

他们就一再地残酷拷打我，我感到浑身骨头都在开裂，我的心也在撕裂。

这以后，我彻底绝望了，我不愿意胡编乱造给自己身上泼脏水，但又看不到一丝希望。我是长在红旗下，每天怀着“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最幸福”的信念去上学，现在毛主席还健在，我这个祖国的栋梁、清白无辜的青年学生却在北京城里遭受暴徒的法西斯般残酷的非人拷打，这反差对我来说实在太太大，令我无法自解，痛不欲生。

每天忍受着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拷问，还逼我承认反党，反毛，反文革的罪行，我看不到任何活下来的希望。与其每天在地狱里煎熬，还不如以死解脱。

我想到了死，寻找着死的办法与机会。

有一天，我从房门小洞往外看到，外面的看守正在看小说，闲聊天，没人注意我。于是我就悄悄地把凳子叠起来，站上去把灯泡拧下，慢慢把手指伸向电极。

年迈的父母亲的脸晃过眼前，一阵阵痛楚掠过心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对不起你们几十年的养育之恩，只好下辈子再报答你们了！”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精神恍惚的原因，叠起来的凳子突然倒了下来，我摔倒在地上。事后有人替我分析，因为我的手指已经触到电极，造成手臂肌肉痉挛、抽搐，致使身体失去平衡才摔倒的。

听到响声，一群看守冲了进来，骂我是畏罪自杀，一定隐瞒了更大的罪行。

审问又开始了。“交待所有的黑会！”他们吼着。

见我还不说，就罚我跪在地上，双手举凳子，说是治我的“不交待症”。

他们还说：“你不交待，我们不会让你好活的，你想死，没那么容易！到我们手里，没有不交待的！”就这样，我连续跪了数十个小时。

他们见我举不起凳子，就用香烟头烫我的手，用手指弹我胳膊上的穴位，用脚踩我的

脚趾；他们见我伸不直腰，就连凳子往上拉，还边拉边骂：“你不是腰杆挺硬的吗？挺起来呀，你为什么不挺了？！”我实在撑不住了，他们就用脚朝我的身上随便乱踢。他们见我仍不交待，就又凶狠地抽打我耳光；他们嫌用手打我的耳光自己的手也疼，于是改用折叠扇子的柄来抽我的脸。

三

就这样，在暗无天日的中世纪的魔窟里，我一分一秒地煎熬着渡过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等来了“七二七”。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的。

奇怪的是大概在工宣队进校的第二天，一个男的还来逼我交待科学馆黑会。

我不答。

他发了疯似地吼叫：“黑会上，哪个王八蛋递给你一张纸条？”

“我不知道这个会。”我答。

这家伙又死命地抽我耳光，还逼我抬起头来，让我看他那野兽般的眼睛达数分钟，还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我的脸被打的烧痛红肿，整个脑袋好像要掉下来一般。

我到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工宣队开进了清华大学，他们这批暴徒的末日来到了，所以他们才发了疯。这是我最后一次被打。

7月29日晚上，我被蒙上眼睛塞上卡车，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才知），在一个洗澡间的厕所里坐了四天四夜（因为414正在营救我们，老团就急忙把我们转移）。

8月1日他们又把我弄回到200号，继续逼我交待，还威胁说：“你听听下面的汽车声，这是卫戍区来抓你们的同伙了。卫戍区专抓态度差的，你至今不老实交待，顽固透了，像你这样也快要带走了。进去的，我告诉你，都给带上三十斤重的铁链，把你的脚磨烂，看你受得了不？你赶快交待！”一边不停地用手晃着所谓其他人的交待材料。

工宣队已经开进清华大学六天了，但是这批暴徒对我的审讯仍然在继续着。在他们的

末日来到时，他们仍然不甘心就这么失败，仍然在顽强地制造“十二人反党集团”，企图临死抓上一根救命稻草。

8 月 8 日，几个男人板着脸进来，阴沉沉地说：“把你的衣服整好，要放你走了。是反革命分子沈如槐（工程力学数学系力 03 班，414 一把手）点名要你回去的。为了拯救我们的阶级兄弟，将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放出去交换，让你们出去表演，表演够了，再抓你进来。”

那天傍晚，我和其他难友终于在工宣队的保护下脱离了魔窟。当汽车离开 200 号时，以刘才堂为首的一帮老团还在高呼“打倒十二人反党集团！”也就是说，在工宣队进入清华第 12 天，这帮专案组的极端分子仍在垂死挣扎！而我们这些难友，个个被折磨得脸无血色，骨瘦如柴，两眼发直，精神木纳。

后来，我们在主楼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围着我们，关心地问寒问暖。这是在 92 天的单独监禁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不是要审问我的人，不是要打我的人，我第一次和不是审问我的人说话。

8 月 9 日早上，这是 92 天的地狱生活以后，我重新又见到了阳光。

我请同学打电报给家里报平安。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年迈体衰的老爸爸，接到电报以后，老泪纵横，颤抖的双手拿着电报，久久不敢打开。他怕呀，他怕看到凶讯啊。我的可怜的父母双亲，女儿的生死安危，令你们牵肠挂肚，使你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现在，噩梦已经过去了，你们的女儿总算活着过来了。

我度过了整整三个月非人生活，被单独监禁；关在黑牢里，和外界完全隔离，没有放过一天风，没有见过阳光，比国民党特务的渣子洞、白公馆还要黑暗。

在那暗无天日的 92 天里，前前后后毒打过我的人，不只是几个人，而是一帮人。那些站在旁边，以看我挨打作为消遣取乐的人也是一帮人。现在，我并不能确切地说出这两帮人到底有多少？是 10 多个还是 20 多个？但是那一张张狰狞的面孔，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人用棍棒打你，用鞭子抽你，用巴掌抽打你耳光，那些用我的

痛苦来寻欢作乐的人，你能忘记他们丑恶的面孔吗？你能忘记他们歇斯底里的吼叫和幸灾乐祸幸的笑声吗？

我那被刺伤的心，没有一天不在滴着血，40 多年后的今天还在滴血。

我被他们打得全身伤痕累累，我的身体被彻底弄垮了，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现在，在我的身上仍可以见到当年被毒打以后留下的厚厚疤痕。在精神上我所受到的创伤，经过了 40 多年才慢慢平淡。今天，当我动笔写这篇文章，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使我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不由得泪花飞溅。

我毕业时分配到宝鸡郊区的一个小工厂，结婚生子。80 年代初，国家开放，托邓小平的福，我随丈夫来到美国，过着平静、自由的生活。

40 多年过去了，身体基本上恢复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后遗症，如失眠、神经衰弱、严重的关节炎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创伤很难愈合。每每想起这一段惨痛往事，心如刀绞、泪如雨下，不能自己。在这里，我要感谢我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的丈夫，是他帮助我抚平了创伤；也要感谢我的两个儿子，是他们给了我温暖、希望与力量；我还要感谢许多老师与同学，是他们给了我理解和支持，使我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现在的中国已经大有进步了，法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但是文革这一段苦难的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听话，服从领导，做实事，也从没有什么异端思想，即便这样，还难逃在文革中被如此侮辱、被虐待的命运。

文革十年是中华民族的浩劫，也是人类的浩劫。要搞清为什么文革会发生？如何防止文革再一次发生，还有极大的阻力，可能仍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2013 年 3 月第一稿

2015 年 10 月第二稿

【述 往】



作者简介

吴琼, 1944 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 1968 年本科毕业, 1981 年研究生毕业, 中国哲学史硕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处长, 编审, 退休干部。著有《〈战争论〉研究》、《〈战争论〉诠释》、《统帅的艺术: 战略——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十讲》等。

难忘的燕园· 1969 年 (一)

吴 琼

现如今, 我已经过了孔子所说“从心所欲, 不逾矩”之年, 以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难以忘怀, 但最难忘的, 还是在“文革”时期 1969 年前后, 在北京大学度过的那一段还没有离开母校的特殊日子。那时, 我只有二十四、五岁, 正好处于一个人的青春期, 所谓人生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毕业前夕, 被押进东语楼“监管所”

1968 年 8 月, 在毛泽东接见全国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后, 北京大学的武斗结束, 由 4587 部队和北京 618 厂工人组成的解放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燕园, 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北大展开。同年 10 月, 军工宣队通知 1968 届本科生毕业, 一律分配到全国各地, 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改造从旧学校带来的资产阶级旧

思想。本来，在毕业分配时，我已经报名，自愿去西北落后、贫穷的宁夏隆德工作，不料，就在还没有领到派遣证的一天傍晚，忽然接到哲学系军工宣队办公室的通知，要我去学生宿舍 38 楼 206 寝室，接受“政治审查”。

38 楼 206 室当时的气氛一改往日的文明和宁静，变得杀气腾腾，十分紧张。只见一张书桌横放在寝室中央，在强灯光的照耀下，书桌上放有非常引人注目的、两大摞一尺多高鼓鼓囊囊的、浅黄色的“卷宗”袋。身体又高又瘦、身穿一身黑衣黑裤、平日不苟言笑的 618 厂工人李元和师傅，整个身子朝前倾，双肩、双手支撑在书桌上的两大摞“卷宗”袋之间，两眼放射出凶狠目光。他劈头盖脸地对我呵斥道：

“你就站着，不能坐下——看好！这两摞袋子里，装的都是哲学系和其他系师生揭发你的反革命罪行材料！”

接下来，他便向我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告诫我必须放弃侥幸心里，必须“竹筒倒豆子”，老老实实在地交待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而在李元和的左右两侧，分别威武地站立有我的四位同班同学：其中左侧两位，居然是北大“文革”运动中与我的观点一致、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兵团”战友；右侧两位，则是与我的观点不一致、一直拥戴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成员。待李元和发言之后，上述四位同学马上加以配合。他们或者和颜悦色、娓娓动听地劝告我，最低限度也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放弃一切幻想，如实交待问题，以便按时毕业到工作岗位上去，获得一个不错的个人前途；或者，声称我的问题已经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不断地对我恐吓、威喝，甚至与李元和一起对我拍桌子瞪眼，走过来动手动脚，强迫我弯腰低头认罪……当时 206 寝室的那种情景，真像读者在一些电影和现代京戏中所欣赏过的戏剧性场面。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对这种遭遇的到来我早有精神准备，并不以为然。当时我想，该来的事情终于来了，躲也躲不开只能强硬对付。所以，无论这五位审讯者如何表演，怎样气急败坏，我的回答只有斩钉截铁的一句话：“我没有反革命罪行。”

审讯在继续，愈演愈烈。38楼二层楼道里鸦雀无声，似乎各个寝室里的同学们都在侧耳倾听……

我站立在那五位审讯者和那张横放的桌子之前的一小块地面上，不时微微眯起双眼，越过五位审讯者的头顶，遥望玻璃窗外阵阵寒风吹拂下不断摇曳的树枝头和路灯的光影，在自己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文学作品《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两位主人公——牛虻和伏契克的不屈形象……

这场突审，一直持续到晚间睡觉熄灯时间，才不得不结束。审讯者们一无所获。审讯结束前，倒是李元和的头上不断冒汗，他不断用一块白毛巾擦拭。他已经完全失去常态，对我大声咆哮道：

“你说你根本没有反革命罪行？你没有？！你现在敢签字画押吗？——这里有笔和纸，料你也不敢！”

我走到桌子前，拿起笔来，在五位审讯者的包围、注目下，毫不犹豫地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没有反革命罪行”八个大字，随后，签上我的姓名，以及年、月、日。

——整整一年之后，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又在解放军军工厂锻炼一年，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次，我从自己所任教的河北衡水到北京探亲。一天中午，我在前门珠市口大街，遇到当年曾经参与审讯我的一位京籍同班同学。那时，耸人听闻的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还没有发生。这位昔日的“井冈山”战友，把我悄悄地拉到街头一角，神秘又带歉意地对我说：“知道吗？当时，206寝室那些‘卷宗’袋里，并没有揭发你的过硬材料，袋子里装的都是一些吓唬你、冒充揭发材料的过期报纸……”当我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不回置一语，只保持沉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践踏民主与法制的事情层出不穷，人们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类似事件既然不幸落到自己的头上，我能够说什么呢？

……1968届毕业生开始陆陆续续离开燕园，匆匆忙忙地奔赴全国各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了。而我，却不得不仍旧滞留在38楼206室，过着囚犯一样的日子，“政治审

查”并没有结束。李元和代表军工宣队命令我：一不得打电话，二不准向外写信，三不得离开燕园一步；只准我在寝室里看《毛选》和报纸，闭门思过，继续交待问题。哲学系68届同学在离校前，有的人紧握我的手说：“挺住，挺住，一定要挺住——挺住就是胜利！”有的人找个借口，来到206室走一圈，非常忧郁地望一望我，点点头，就算告别了；还有京籍的两三个同学，悄悄记下我母亲家的在京地址，向我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由他们去转告——而我自己只能听天由命，无聊又忐忑不安地消磨时日。我还听说，军工宣队领导班子里，对处理我的问题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学生出身不错，又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何苦就这样把他扣住不放呢？但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有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要等全校的“清队”运动全面展开以后再看，也许，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就会发现严重问题。……就这样，到了10月末，事态竟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1968年的冬天比往年来的早些。10月末的一天上午，天气寒冷，从白天夜里开始，燕园里便开始落下初冬的第一场雪，不过，落下的并不是那种鹅毛大雪，而是像小米粒大小般的“沙沙”小雪。在一个参与过对我审讯、个头不高、还没有离校的同班同学的押送下，我冒着小雪从38楼走出来，肩上扛着铺盖卷，手上提着一个穷学生所有的全部不值钱的网兜、脸盆、生活用品，离开学生宿舍区，由南向北，穿过图书馆、办公楼，走进了北京大学西校门附近的东语楼——当时北大哲学系的“监管所”。

第二章 学习马列著作小组变成“反革命读书会”

那时的东语楼内，关押着哲学系几十个年龄不等、从60岁到20岁左右的男男女女，所谓的“走资派”、“黑帮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学生”。他们统统集中关押在东语楼一层的西头，以一个洗手间为中心的几个大小不同的教室和房间里，接受“政治审查”。一间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被用来充当审问室，每天从早到晚，就在这个阶

梯教室的入口处最高一级阶梯的层面上审问犯人。看管犯人的红卫兵值班室，设在审讯室的对面，隔着楼道就是洗手间，红卫兵值班室是一个狭长的房间，驻有军工宣队所信任的哲学系 69 届和 70 届的本科生。我被押进与红卫兵值班室仅一墙之隔的一个教室里，在这个教室的地板上，铺有两张供犯人睡觉用的草垫子，临窗有一桌一椅，供审查对象写交待材料之用。

当我关上这个教室的门，把肩上扛着的铺盖卷放到一个草垫子上之后，转过身来，发现在临窗的另一个草垫子上，按照监管所的规定，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他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一付金丝眼镜、面目慈祥的先生。这位先生正是蜚声国内外的数理逻辑教授、英语非常好、过去被称为“燕京大学三大怪”之一、终生未婚的吴允曾先生。吴先生端坐在草垫子上，头一动不动，用他那特有的、沉稳而又亲切的嗓音对我说道：

“欢迎你来和我作伴儿。我被怀疑是个美国特务，你的罪名是什么？——我早就认识你，过去，全系师生开会唱革命歌曲时，总是你在台上指挥，指挥得不错。你还是‘井冈山兵团’《新北大报》的主编，‘新北大公社’《新北大》报的主编是宋一秀——两种观点对立的小报主编都出自哲学系。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你也许会在这里和我一起消磨一段时日……”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和老实巴交、治学态度非常严谨、记忆力惊人、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逻辑学和计算机软件事业的吴允曾先生成了至交。在两个多月共处一室、朝夕相处的患难日子里，我得到过吴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一生难忘，现在每每想起来便热泪盈眶……

我到监管所后没过两三天，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我家的老五、老六，“文革”发生时还在上初三、初一的妹妹和大弟弟，匆匆忙忙来到东语楼探望，给我带来两条《恒大》牌香烟和 10 元钱。她们告诉我：还没有把我被关押的事让母亲知道，母亲的身体很好，不必挂念。她俩离开东语楼时，我把妹妹叫住，特别叮嘱她说：这件事务必也不能让我的高中女同学马明明知道，要代我多看望她几次。妹妹含泪连连点头——因为，当时只有妹妹知

道，我已经与马明明订婚，而马明明患有心脏病……

自从被关进东语楼之后，军工宣队便更换了审讯我的人。他比李元和年轻，也姓李，长得很结实，也是身穿黑衣黑裤，脚上总是穿着一双擦得贼亮的黑皮鞋。此人原来是 618 厂保卫科的一个干事。他每周两次坐在阶梯教室最高一层一把宽大的椅子上，面对面地审问我。不过，李干事与工人李元和不同，他不像后者那样，在审讯我时不断地大喊大叫、威胁、咆哮，而是寡言少语，经常在审问我时故意停顿几次，有意识地让审讯冷一冷场，以便制造出一阵阵紧张的气氛，给我施加无形的精神压力；只有在审讯的关键时刻，他才从口中甩出一、两句十分刺耳、难听、气人的话。总之，他好像早已料到我不会松口，决不会承自己有“反革命言行”；他似乎在应付差事，每周只来审讯室和我见两次面，消遣消遣。

是的，俗话说的好：“咬人的狗并不叫”。阅历不深的我，可以说真是低估了这位 618 厂保卫科的小干事——到了 1968 年年底，我的案情突然有变，情况直转而下！

1968 年最后一天的一大早，天还没亮，李干事打破常规，提前在东语楼阶梯教室突审我一次。这一次，他仍然没有收获。可是，在突审即将结束时，他的表现却与以往不同，态度相当诡异。他轻轻松松地舒展开身体，半坐半躺在那个椅子上，面部表情分明是朝我微微一笑，却又迅速收敛起笑容，“腾”地突然站起身来，举起右拳在我的鼻子前挥舞一下，咬牙切齿地叫嚣道：

“好，好，好！！你的态度很好很好——既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又不揭发别人，真有一股子别人没有的江湖义气，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硬汉子，大英雄啊！不过，我现在要严重警告你——你的事儿，很快就见分晓！”

他说完这番话，就夹着文件包扬长而去，把我丢给了值班的红卫兵。

那是 1969 年 1 月 2 日的上午。落下几天飘飘大雪的燕园里寒气逼人，但是空气清爽的很。所有古香古色的建筑物房顶上，还有高低大小不同的树木、灌木丛和地面上，都落下了厚厚的积雪。太阳出来了，照耀得人眼花缭乱。从东语楼通往南面学生宿舍区的大路和

条条小路上，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大约上午 9:30，李干事把我叫出东语楼，特别递给我一个又宽又大的棉口罩，叫我戴上，把脸遮住，然后，引领我往南走。他走在前，一个看押我的红卫兵走在后，把我夹在中间，一行三人踏着积雪，一直走到学生宿舍区的学四食堂。进入食堂后，三个人都不声不响地背靠在食堂东墙靠窗的一排暖气片上。只见这个食堂已经布置成一个大规模的批斗会场，在食堂北墙一个个卖饭的窗口上方，展开一幅醒目的“批斗反革命分子 XXX 大会”的红色横幅标语，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包括驻校军工宣队队员，共约两千多人，早已坐在自带的方凳或椅子上，正等待批斗大会的召开。会场的气氛相当紧张，有一股子萧杀之气，无人说话。

批斗大会开始了。先是驻校军工宣队领导人讲话，他高调阐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北大“清队”运动的大好形势，向各系师生员工代表交待“清队”的方针政策，严厉警告那些还在负隅顽抗、暗藏的阶级敌人，必须无条件地交待自己的严重政治问题……随后，这场批斗大会的主要批斗对象上台发言，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北大“文革”运动中同我的观点一致、个子矮小的外系同年级同学。这位外系同学用不断颤抖的手握着扩音话筒，慷慨激昂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声泪俱下地回顾自己苦难的出身和在党的关怀、教育下的成长过程。他痛心疾首地批判自己在任《新北大报》主编时，组织起一个“反革命读书会”的滔天罪行，此后，他又揭发另一个《新北大报》主编，如何猖狂地向他散布恶毒的“反革命言论”，他又如何向其他一些同学扩散了这些“反革命言论”。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警告在场的北大师生员工代表，任何犯有同类罪行的反革命分子，都必须以他为榜样，效法于他，向军工宣队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严重问题……

这场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场上真可谓群情激昂，严肃热烈，声讨声和口号声连接不断。最后，大会在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戴着口罩，遮住脸，背靠在热烘烘的暖气片上，我自始至终关注着大会进展，仔细辩听从扩音器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当那位自我揭发、批判的“井冈山”战友开始发言时，我

并不感到新奇和诧异，因为，他“文革”时一直是燕园里的一个活跃人物，经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辩论会场，他的发言一贯高调，富有煽动性。然而，随着他在这场批斗会上发言的继续和深入，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尤其是，当他说《新北大报》编辑部里有一个“反革命读书会”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他说的话不可思议，简直是海外奇谈！但是，当他提及《新北大报》另一个主编对他如何散布反革命言论时，刹那间，我们心房不由得一阵紧缩，继而“咚咚”地加快跳动，我一下子傻了眼——原来，他所揭发的那些对他散布的所谓“反革命言论”，其中的实质性部分是我，确确实实就是我本人，亲口对他说的话！

开过批斗大会，各系师生员工代表离开会场之后，我又被押回东语楼。在踏雪返回东语楼的一路上，我的心情变得极其恶劣，又气愤、又失落、又沮丧，坏得无以复加，以至于看到燕园里的一切景物——南阁，北阁，图书馆，办公楼，办公楼前那两根高高的汉白玉华表柱子，等等，我觉得它们统统都变了，变得歪歪扭扭，不像样子，一塌糊涂，甚至于燕园里的一木一草，乃至大地和天空，都改变了往日的颜色……

当回到东语楼的那间教室，李干事离开我以后，红卫兵把吴允曾先生叫到值班室，说了几句话。神色凝重的吴允曾先生返回房间，立刻为我从暖瓶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他欠下身，对坐在椅子上发呆的我说：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现在你要冷静，沉住气，不要多想，身体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是，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

是的，不错，现在要冷静，不要多想。可是，我能够冷静，能够不多想吗？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直在回忆，判断，思索，忍不住一直想呵想呵，午饭和晚饭不吃，水也不喝一口，整整一天都在不断地想，以至于倒在草垫子上以后，还在思索。我一夜无眠。

我想到：“文革”时的《新北大报》编辑部共有六位编辑，大家分别来自哲学系、中文系、西语系、化学系，五个男生，一个女生，由揭发我的那个外系同学和我两个人担任主

编。但是，活见鬼！我们从来没有组织过“反革命读书会”呀！如果说，我们六个人在一起认真读过书，那是真的。那是从1967年夏到1968年春，当1967年“一月革命”发生，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以后；当江青号召“文攻武卫”，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展开武斗，全国大乱以后，众所周知，全国大多数的师生都厌倦了这种没有章法、乱哄哄、自相残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都变成了力图摆脱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消遣派”。正是为了不虚度青春年华，认真学习那时还允许学习的书籍和知识，《新北大报》的六位编辑在北大28楼原编辑部的房间，自发地开始阅读并讨论马列著作。我们一共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易·破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五本著作，更何况我们在学习讨论中，只是讨论马列原著的内容，从来没有议论过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文革”运动。这样的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小组，怎么一下子忽然变成了“反革命读书会”呢？

我还想到：如果说在那段时间和此后的一段时间，确实有议论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事情的存在，也不是发生在《新北大报》六位编辑学习讨论马列著作的时候。原来，从1966年底到1967年2月，因为我本人对这场“文革”和北大运动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到奇怪、不可理解，为了弄清事实的原委和真相，我一方面阅读了一些马列、哲学、历史、政治书籍，另一方面，翻阅了收集来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量小报和材料，经过个人独立思考，并且结合自己的亲身见闻，于是，形成对建国以来直至“文革”运动的几点看法。我当时认为，第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对彭老总的那种批判、斗争和处理是不公正的、错误的；第二，1962年“七千人大会”纠正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政策错误，则是正确的，是不应该后来“炮打司令部”，以林彪取代刘少奇在党内位置的；第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说明在党内存在一条“左倾”路线，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当然要负错误路线的领导责任——由于在《新北大报》六位编辑学习讨论马列著作以后，编辑部有些杂事还需要两个主编处理；又由于那位外系主编多次声称，他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难以理解，例如，66年“五·二五”聂元梓贴大字报；“七·二五”江青在北大东操

场讲话；67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七·二〇”武汉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抛出“王关戚”后，又揪出“杨余付”等等。他多次央求我谈谈个人看法，加之，他一再向我表示：“我非常非常苦恼，寝食不安。无论是对是错，请务必谈谈你的看法，不成熟也可以。我一定保密，决不会对其他人讲——刀架在脖子上也绝对不会泄露出去……”。

于是，我就断断续续对这位外系同学，我自以为非常可靠、值得信任的“战友”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我哪里会料到，到了军工宣队进校开展“清队”时，到了毕业前夕，这位当初信誓旦旦的“战友”，不但把我讲的一些违禁的话，作为“反革命言论”向专案组合盘端出，又在批斗大会上揭发、批判呢？

随后，我又想：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些看法，对揭发者说过的这些话，又可以统统承认下来吗？如果承认下来，那么，会给我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啊！那是要真的给我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株连母亲和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呀！可是，如果拒不承认，如今证人证词俱在，军工宣队能够就比轻易罢手，让我逍遥法外吗？

……在令人恐怖的深夜里，我在草垫子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于是，索兴披衣起身，在那间教室里踱来踱去。窗外，北风呼啸，还带着哨音；教室内，吴允曾先生躺在草垫子上，也一夜未眠，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欠起身来对我说：“睡吧，睡吧，躺下来睡一会儿……一切等天亮再说。”可是，处在那种环境和心绪中的我，是不可能停止踱步思考的。

我预料，发生在燕园里的这场“清队”运动非同小可，像这样在政治高压下一个人揭发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再揭发另一些人，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凡是有头脑、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北大人，对这场运动都不免会有自己的看法，也决不会把这些看法只是闷在心里，不对自己的妻子、丈夫、最信任的亲朋好友进行交流。而这些在私人之间进行的思想交流、所议论的内容，假如全部被揭发、披露出来的话，那么，势必不仅在燕园，而且在社会上会牵连出许许多多，那么，这些人岂不统统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划入反革命阵营中去吗？

我又向自己：凡是正常的人都有一颗正常的头脑，这颗正常的头脑不就是为了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支配自己的行为、采取行动的吗？而现在军工宣队这种“清队”运动的一系列做法，难道是想从根本上剥夺人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吗？

我整整思考了一天一夜。

我最后决定：第一，那种违背内心良知和道德铁律、揭发他人的丑恶之事，我是决不能做的，至少，这种丑事到我这里必须中止；第二，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符合客观实际，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所以，必须坚持；第三，“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应该把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书写下来，公开出去，留给历史和后人，然后，就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免得承受我不想承受的、那些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以及人身污辱。

做出上述决定以后，我见天已大亮，便推门走出房间，敲开红卫兵值班室的门，向他们索要了纸和笔，然后，回到房间坐下来，痛痛快快地书写下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运动和“清队”运动的全部看法，毫不隐晦，淋漓尽致，竟一口气写了三十多页纸。写完后也没作修改，我马上交给了在红卫兵值班室里等候多时的618厂保卫科的李干事。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别人对我都说了些什么，我对别人又说了些什么，我都忘记了，回忆不起来。但是，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的交代材料。请你过目，并请呈转有关部门。”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洗手间方便。当我经过红卫兵值班室时，只听见那里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喧哗，估计他们刚刚看完我写的交待材料。有两句非常刺耳的话很清楚地传到我的耳朵里：“这也太反动、太恶毒、太系统啦！对这个反革命分子必须进行严惩！”■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三）

——红卫兵运动

陆伟国

三. 红卫兵

1. 红卫兵的出现

高层分歧的蛛丝马迹，首先为一些高干子女所察觉，觉得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传统体制出现裂痕的时候，他们力图要抢在前面保住和扩大自己既有的特权地位，抢先冲击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冲击的对象。他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决心在这场大动荡中打头阵、立头功。由此，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为武器，这样的红卫兵首先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出现。一开始，是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卜大华等八个人，为对抗校领导和工作组的压制，最早成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6月24日，他们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响亮地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红卫兵成立大会上，他们托江青把这份大字报带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可用之处，立即给予高度肯定。几天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的文件之二正是《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信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对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同时，还发表了他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本节的具体事例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毛泽东和中学红卫兵的想法交汇到了一起。红卫兵运动受此鼓舞，一下子就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地掀起来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北京各大中学校纷纷建立起了红卫兵，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到处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清华附中的几个年轻人把他们战斗队的名字叫作“红卫兵”，有它的偶然性。而毛泽东要按照他的思路甩开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放手推进文化大革命，急需要有一种非常手段，这又有它的必然性。红卫兵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它作为运动很快地兴起，就是这两者的结合。按照辩证法的说法，这就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必然性中有偶然性。

北京高校中，建工学院是在8月1日第一个成立学生群众组织的，叫“八一战斗团”。人民大学的朱佳木等十几个高干子女，这时也很快于8月8日在刘平凡的家里成立了“人大红卫兵”。朱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朱理治之子，他本人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校保郭派的人当时还为他父亲三、四十年代是否在北方地区执行了左倾路线而进行了争辩（郭影秋是那条路线的直接受害者，后面要提到）。刘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二女儿。人大红卫兵是全国第二个成立的高校红卫兵（第一个是北京水电学院红卫兵，8月3日成立）。不久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人大红卫兵也是唯一上城楼的叫作红卫兵的高校群众组织，别的高校还几乎没有叫红卫兵的。不过那几天校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已经有了“人大红卫兵”的这件事。人大的学生，相对来说，对政治比较敏感，而不那么张扬。

在观点上，“人大红卫兵”算是造反的，具体讲就是反郭的，认为“郭影秋是走资派”，要“打倒郭影秋”。另外更多的人则参加了“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八”算是保守派，保郭的，认为“郭影秋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我们的好校长”。此处的造反与保守、反郭与保郭，均无褒贬之义，后面全文皆如此。

我们这些比较“保守”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几天之内，看着校内校外突然冒出来到处都是红卫兵。随便几个人就可以自己组织起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名称大都叫什么“红色”、

“革命”、“造反”、“卫东”之类，或者从毛泽东诗词里找的“云水怒”、“风雷急”、“千钧棒”、“全无敌”等等。既然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咱们也是闹革命，那咱们也就是红卫兵了。我们也就个个都戴上了自己做的红袖章。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和承认，自己就戴上了。一开始连个名称也没有，就是红卫兵。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用毛笔写的。不像那些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讲究得很，谁能戴多宽的红袖章，能用什么样的布料，得看他老爹的乌纱帽有多大，等级分明得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封建专制的腐臭味。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我们才又加上了“八·一八”三个字，作为前缀。8月20日下午，人大的“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东升联络组”的基础上，在吴玉章秘书王仲柏等人的推动下，由张联瑜等同学的组织下在大教室宣告成立。我们相对保守的，便都算在里面了。那天人大红卫兵还想来搅局呢，无奈那时他们的人太少，还成不了气候。后来，我们才换了统一印制的黄字红袖章。也没有另外推举班级里的红卫兵负责人，班干部还是班干部，继续负责。

想说明一点，当时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所谓“红五类”，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和中学的学生干部。因此，没有其它学校学生中有多种成份、多种阶层的情况。在其它的很多学校里，尤其是在一些中学里，从“文革”一开始同班同学之间就出现一部分同学欺压另一部分同学，而后，那另一部分受欺压的同学又趁着造反起来反击。那种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势头就出现在班级里。仅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仅这一个系，在62、63、64级中就都有学生在“文革”中自杀身亡（请见：《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 1910-2010》，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有的学校，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同学，在食堂里吃饭前，先要低头认罪，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狗崽子……”十几遍之后，才能被允许端起饭碗。在一所知名高校，一个女同学被批斗后服毒自杀，在她临终痛苦呻吟最后挣扎时，她们班的同学竟然围在她身边反复喊叫着：“狗崽子，狗崽子，狗崽子，狗崽子”直到她死去。或许其中很多人也并不真心想这样做，但已经足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场大革命中已经变态扭曲到了什么程度。而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在“文革”中就

一直平和相处，即使后来分成了两派，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甚至连争吵也没有过。这是和其它大多数学校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现在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地写这份回忆录的原因之一。

那时，各人都在自己想办法找来旧的黄军装、黄军帽，要是草绿色的，那是最时髦的了。对于我们人大的很多学生，倒是有现成的。那就是去社教时发的旧军装，虽然已经破旧了，但好歹也是黄军装吧，不是假的，凑和点吧。说不定，这破旧还说明你有资历呢。对中学红卫兵人人都有的铜头皮带，我们都不知道能从哪儿搞到，只好随便弄一根皮带就扎起来。再去买一顶看上去像军帽的帽子就行了。这一打扮，穿起来，相互看看，都觉得挺新鲜也挺好笑。

为了表示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还兴了一阵改姓名的风，自己的名字也要跟上革命的形势。不少同学就在广场贴出大字报，或在寝室门上贴个告示，说自己改了个什么名。我们班也有好几位同学改了。比如陈荣祖改名为陈江、薛余才改名为薛岩、黄金藻改名为黄牛、常殿玺改名为常新、夏宗勇改名为夏忠勇等等。我们的班长最近才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他那天下到二楼去找我们班一直待人真诚的朱“大姐”，敲门喊她的名字。不料她出来却一反常态，很认真地指着门上的纸条说，你没看见我们都已经改名了。这才知道她也改了名，叫朱丹。弄得他差点就笑了出来。我自己，好在我的名字很大气，陆伟国，“伟大的祖国”或“伟大的中国”，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省了这个事。

但是，我们很快发觉，发动红卫兵运动，显然不是为了热闹、为了好玩，而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非正常的极端的状态。

（还想说两点，第一点，我不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在青年学生之外最早的群众组织是哪一个。但是1966年8月6日在人民大学就有了个有保郭倾向的东生联络组，推举老职工、老红军李文华担任组长。这应该说是相当早的学生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说不定很可能是全国第一个。

第二点。8月8日那天，还成立了人民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余景清，副主任

李豫生、江春泽。后来余景清和李豫生俩人结为夫妇。余景清已于 1993 年不幸去世。江春泽后来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李豫生则至今仍在为社会正义而奔走努力。)

2. 毛泽东接见

在红卫兵出现之后，毛泽东又抓住机会，迅即以他特有的宏大手笔把红卫兵运动推向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高潮，那就是亲自接见红卫兵小将。在 1966 年的下半年里，他先后八次共接见 1100 万红卫兵，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壮举。

第一次那当然是最著名的“八·一八”了。8 月 18 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大海浪涛般涌动的红卫兵招手致意，并分批接见了聂元梓、卜大华等代表人物，也包括人民大学的双方代表。在接见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时，毛泽东说了那句有名的话：“要武嘛”。宋，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1980 年就移居美国，由“革命小将”摇身一变如今已成了美籍华人。看看那些当年的“革命者”变成了地道的美国人，今天的“拥左者”们情何以堪啊。

那天，接见快结束时，毛泽东等人已开始走下城楼，刘少奇被甩在后面，孤独地站立在城楼的拐角处。下面一大群红卫兵见了，还在天真地一遍遍地喊着：“刘主席，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当时虽然还不能预见到刘少奇最后的悲惨结局，但刘显然已经失势，应该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这种像朝圣般的时刻，也有不那么神圣的事：据凤凰卫视 2003 年 12 月 6 日播放的鲁豫对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的采访节目《叶向真跌宕起伏的人生》里，叶向真说：“有一次回来，他（指叶剑英）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不是接见几次，在天安门接见嘛，全国串联的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鲁豫疑惑地问：“为什么？”叶向真答：“……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

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可见，从一开始有些红卫兵狂热分子就已经是和强盗土匪一路货了。不过，我在当纠察的时候，可没遇到这样的“好事”。但我们系低年级同学中就有趁着红卫兵抄家而截留金银财物的，因不长时间就被发现而交出，就未作处理。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我作为一个首都红卫兵，几次参加了维护秩序。接见的方

式，有几次不同的变化。开始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主要是外地中学生）列队在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通过。这几次，我们基本上都站在天安门前。看着满含着热泪的红卫兵们尽情地跳着、叫着、喊着，我们则催促他们快走。

由于红卫兵们在通过广场时过于迟缓，时间过长，队伍拥堵，不易疏导，所以在10月18日的第五次接见时，改为红卫兵排在大街两旁，由毛泽东乘坐吉普开过。这时，我们就和军人一起，挡在红卫兵列队的最前面，排成一排，以防止后面的红卫兵往前踊。

那天，我的位置是在农展馆前的东三环拐角处。近百米宽的大道，笔直地向西和向南延伸，在蓝天和绿树的衬托下，气势非凡。大道两边都是红卫兵的海洋，几十人宽的队列，向两个方向延伸，绵延不断，伸向远方。150万红卫兵列队长达50华里。翻卷的红旗，湧动的绿军装，一直铺到无尽的天边。现场上声浪滚滚，各种“文革”歌和语录歌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一会儿这边唱：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一会儿那边唱：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终于大喇叭里传来现场指挥部的指示：“请安静。”原先沸腾的海洋，一下子安静下来，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一点多钟，这一时刻终于来了。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那庄严磅礴的乐曲声：

少少拉唛，叨叨拉唛，
少少拉叨拉少，叨叨拉唛。

这是一个只有特殊时刻才播放的乐曲。

顿时红卫兵们沸腾了，排山倒海般地爆出欢呼的巨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盖过地，盖过天，似乎盖过天地间的一切。人在其中，几乎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在压倒一切的欢呼声中，在秋天的阳光里，毛泽东的车队从远处开来了，在摩托车队的前导下，一辆吉普、后面又接着一辆辆的吉普，从我们面前驶过……

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车里。他身着崭新笔挺的草绿色军装，身材高大，巍然不动；两眼凝视前方；左手扶前面的车把，右手半举，缓缓地动了下；脸庞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一层薄薄的光彩……

因为正是在拐弯处，车队减速缓行，我看得很真切……

后面，林彪、周恩来各一辆。再后面是合乘的，能认得出来的，有江青、杨成武、谢富治这些。

后来知道那天差点出了大事。按《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的

文章《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说，那天下午，毛泽东的车队从我所站立的农展馆前开过去后不远，在大钟寺东侧被数百名刚到北京的激动的红卫兵围住，有的甚至爬上了后面的吉普车，卫戍区紧急出动在北太平庄的四个机动连，开出一道人墙通道，才使车队安全脱离险境。那天，北京卫戍区出动了所有四个师的兵力还不够，还调用其他军兵种的力量。

于是，11月3日的第6次接见，又另想了个办法，据说是动用了6000辆大卡车，把红卫兵装上去，开过天安门广场。那天，我的位置是在革命博物馆北侧的长安街上。六辆卡车并行而过，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真的是蔚为壮观。这时，我们就省事多了。但实际上，为防意外，车速不快，花的时间也不少。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维持秩序的活动。

在张辉灿的那篇文章中还讲到，这年的11月26日，毛泽东改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结果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这之后，就再没安排这样的活动，这天的就成了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目光也已由红卫兵，开始转向了新起的造反派。

3.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8月5日，毛泽东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提出当前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知着重在鼓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起来闹革命，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并且强调，不许用任何借口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个决定正式标志文化大革命由刘少奇派驻工作组的做法进入到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派阶段。

8月10日，毛泽东出现在中南海府右街西门的群众接待站，极为罕见地直接号召群众：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11日）

尤其是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标志，把运动推向了颠峰。

这一年的8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出现了大规模的血腥暴力行为，政治运动染上了恐怖的色彩，被称为“恐怖的红八月”。在这前后，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浪，山呼海啸般地压来，仅存的一点半点的理性都被横扫得荡然无存。当然“红八月”的时间划分也不是绝对化的，并不是从8月1日开始到31日结束，七月底就开始了。

人大校园里也一样是恶浪四起。从七月底开始，出现了大规模批斗，校领导、系领导、一些老教授都被拉了出来。根据那时的“革命逻辑”，是个领导就是“走资派”，是个教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也未能幸免，学生干部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出身不好那就更是“狗崽子”，至于“叛徒特务”、“漏网右派”、“孝子贤孙”、“残渣余孽”等等等等，各种名目不一而足，要什么有什么。第一场大规模批斗会是在7月27日。会上，所谓的“黑帮”们，个个都被挂黑牌，戴高帽，低头而双手反翦，即所谓“喷气式”。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不然，一个扫荡腿就叫你跪在地下，甚至故意从桌子上推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再全身被踩上脚。因为，有句话说：“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会后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这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的事了。“黑帮”们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黑牌，写着打上红叉的各人的名字，被人押着、按着、拖着往前拉，稍有不从，便劈头盖脸地拳脚相加。被游街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有的深深地埋着头，像是怕被人认出来；有的像是在听命，任别人拖拉；有的则是满脸愤恨，这样的人吃亏最大、挨揍最多、最叫人可怜。《教学与研究》的主编王南真是个好汉，就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被人摁着，却还是一次次地挣扎。批斗他的人吼叫着：“说‘我是黑帮’！”他却一次次地反抗着：“我不是黑帮，我是王南！我不是黑帮，我是王南！”我还记得，一个所谓的“反动学生”，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了，被压着几乎是横倒在路上，硬是被拖着过来，衣服都撕破了，上面

是点点血迹。在狂吼的口号声中，在看热闹的人群夹缝中，鱼贯而过。

“文革”中，对批斗对象，先叫你自己承认“罪行”，将污水往自己身上泼，再像猪狗一样地在大众广庭之下被批斗。这种做法，极度侮辱人格、彻底摧毁人的尊严，叫被批斗者无地自容、永远抬不起头、永远被踩在脚底下，这是极左势力最为卑劣的做法，以永远形不成对他的威胁。

在拖着、拽着“黑帮”们游街的年轻人里，表现并不一样。有的兴奋得很，革命啦，这下可是革命啦，最好是像那个被称为“头号无产阶级文学家”的高尔基呼喊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有的更是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起劲得很，却忘了做人的起码道理。啊呀，我也有今天啊，也有轮到我高人一等的时候啊，把别人拽在手里就像拽小鸡一样，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这种痛快的感觉可是从来没有过呀。也有的看来是在应付差事，不知是被谁叫过来要完成这个革命任务，虽然嘴巴也在喊着，不过那声音的响度、手上动作的幅度，显然是打了折扣，这场面也难为这样的人了。

路两边看的人中，也是表情各异：有的诧异，有的惊恐，天哪，这是怎么啦；有的似有同情，又不敢言语；有的脸色沉重，担心着会不会下一步就要搞到自己或自己亲人的头上；也有的跟着亢奋，那意思好像是怎么没叫我一起来。

（1966年7月27日，文化广场上的批斗会。笔者也在人群里面。）

不但全校性的大会斗，第二天7月28日，各系也都开会斗。其中，要讲一下我们系的王命先老师。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儿子。1952-1954年在人大学习，毕业后留在我系工作。他虽身为高干子女，却工作认真，为人诚恳。可能是早就知道党内高层争斗之凶险，他做人做事，一直都非常的低调。也就是在这个月，为我党和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革命家王稼祥被赶出中南海。王命先老师更是抑郁不安，知道难以躲过这场风暴。那天他从批斗会出来，回家后不久，就去了京西运河投河自尽。第二天，尸体被发现。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批的罹难者。

那场批斗会是7月28日的下午，地点在老俱乐部。在一阵阵“打倒×××，把×××

揪出来！”的狂吼中，一个个老师被事先准备在两边的学生架着推上台，连辅导员们也都 被押了上去陪斗。我印象很深的是，王命先老师在被念到名字后，没等别人来架，是自己走上台的。

想说明的是，7月27日、7月28日接连两天的大规模批斗，是工作组的“杰作”。是因为他们听到了风声，得知毛泽东回京后，在前几天狠狠批评了工作组压制学生、压制运动、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于是乎，就一反常态，暂时放下“抓游鱼”、“清理反动学生”，转向狠斗“黑帮”以自保。但是，这一切，对于工作组来说，都已经晚了。校工作组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在7月25日就已经决定了要撤消工作组。工作组组织大规模批斗的第二天，7月29日，已经不新的新市委就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公开宣布撤走工作组。由此看来，不管是有工作组还是没有工作组，只要是执行左倾路线那一套，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所遭受的灾难来讲都是一样的。

8月上旬，农经系的曾老师在东风二楼后侧因所谓历史问题跳楼自杀，头朝下，穿蓝色中山装，很多人围观。人民大学在文革中采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曾老师或许是第一个。

看到往日备受尊敬的老师们一个个像狗一样地被拉来拉去批斗，被戴高帽、挂黑牌，受尽屈辱，心里很难受。在那些黑云翻滚的日子里，今天听说这个老师死了，过几天听说那个老师死了，作为学生，心里在流泪。

4. 飞来横祸

在这疯狂的岁月里，以摧残人格、摧残肉体、乃至摧残生命的批斗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所有的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成分高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翻在地。这么多的“反革命”、“走资派”、“黑帮”，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吗？整整十年的“文革”，及其后的几十年里，都没有拿出半点的罪证。不但如此，甚至连普通的小老百姓也经常 被无辜伤及。

另一方面，在这种本单位的批判争斗中，并不都是单纯地出于革命的热忱，很多情况下是夹杂着其他的因素，最常见的有：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以埋葬别人的命运前途为代价，有的是过去留下的个人矛盾和恩怨，有的是为了扫除自己向上爬的绊脚石，有的完全是在闭了眼睛说瞎话，有的纯粹是在发泄，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到无辜者的头上。在这风浪起伏中，各人的表现和遭遇大不相同。有的往这方面表现，有的往那方面表现；有的突如其来，有的始料未及，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

有句话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喜欢“窝里斗”，而是中国的这种体制，这种封闭集权的体制，叫人只能“窝里斗”。因为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成员没有别的发展途径可走，只能是挤掉别人、踩着别人往上走。社会的封闭和挤压，使个人利益只能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才能得到伸展而没有别的空间。古今中外这种体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残酷无情。一点小小的事情，甚至没有什么事，也会酿成大事。在这场大革命中，这些都成了常事。

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系邻班有位同学写了份大字报，不知怎么想的，落款写了个“主席门下之犬”。这本是古人极为自谦、极为自贬的说法，表示自己在领袖面前极其卑微。哪知，另有种人这时候就特别起劲，为了充分显示自己的思想觉悟高，就拿着放大镜到处找别人的毛病、挑别人的刺，有没有“不革命”的地方，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全然不顾别人将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还真有人把这拿来一分析、一上纲，说：“难道主席还有门下之犬吗？主席还用得着‘走狗’吗？”更有说门字下面有条犬，不就是“戾”字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要是讲出来还了得啊。一个平常很普通的同学，立马就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和批准。于是，整日里就被大会斗、小会批，受着横来之苦。我不知道这事情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种狂风恶浪中，还真有这种想害人的人，而此时善良的人们已人人自危、防不胜防。

我也差点被咬了，成了这场运动无谓的牺牲品。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班的田永祯同学喜爱文学，写了个小短剧，讲的是大革命时期农民游击队的故事，用钢板刻印了一份。因

为相比较来说，我稍微算是会画一点，他叫我帮他画个封面。因为题目叫“一把大刀”，我就省点事，画个最简单的，左上方刻了个五角星，表示党的领导，右下方则是一把大刀。几天后，我在他那儿看到印出来的稿子，封面上有人用铅笔莫名其妙地写着“反动漫画”四个小字，颜色很浅，字迹也很轻。我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忙说：“别当真，别当真。”我说：“别瞎来哦，把革命的说成是反动的，他自己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吗？”他也说：“是的，是的，我马上擦掉。”我又说：“你这个剧本也别往外拿了。现在都在宣传革命样板戏。你拿出这个来，说不定背后也会有人说你别有用心呢。”我说的是实话，真不是吓唬人，江青好不容易正在大力推广样板戏呢，这个时候能容忍出来别的戏么。他也真的再没拿出来，再没说他写剧本的事。我们班的同学也从没说起过这事，推测是他们文学社的某个人自以为是写上去的。

这件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躺着也中枪啊。这引起了极大的警觉，不咬人还得防备被别人咬。我就再也不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连大字报、大标语都不写了。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在机关里，我才又拿起笔，一年要写的文稿得数十、上百件。后来，我和田永祯同学的联系还是挺多的。他几次来南京看望过我，还请我为他负责的“陕西工人报”写稿。不过，我们都没有再提那件事。我始终不知道那四个字是谁写的，也不想知道了。

5. 恐怖“红八月”

恐怖“红八月”是最叫人领教红卫兵的派头了。北京大学7月26日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就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等人就在台上，非但没有制止，江青还上去拥抱彭小蒙，并发言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没过几天，形势更变得吓死人了。8月5日，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本校的女红卫兵活活打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河”（请见《动荡的青春》，叶维丽，新华出版社，2008年）。

尤其是8月中旬后，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搞“破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

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到之处就像决堤的祸水，打砸抢烧杀抓，为所欲为，横行无阻。这就是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典型标志的令多少人心惊胆颤、家破人亡、切齿难忘的恐怖“红八月”。

那时难得出去一次。有一天，去西单，只见商店的招牌纷纷被砸掉了，甚至有的橱窗也被砸碎了，贴上了写着“卫东”、“革命”、“工农兵”之类的新店名。有好几拨人在游街，头戴高帽，脸涂黑墨，身上衣衫破损、血迹斑斑，有的还缝上布条，上面写着“狗地主”、“老右派”之类，被红卫兵押着、拖着、没头没脑毫无理由地随意打着，步履摇晃，嘴里还在凄惨地喊着：“我是黑帮”、“我是吸血鬼”、“我是狗崽子”。路上的行人也都行色匆匆、神色恐慌。

这比起人大校园里的批斗，又升级了不知多少个档次了。面对这样恐怖的局面，还能再说什么呢？那些日子里，我们也不想出门。面对街上一队队气焰嚣张、狂傲无比的中学红卫兵，连我们这些大学生红卫兵也都无语，除了叹气、反感、厌恶，还能做什么呢？那些人是完全丧失理智，六亲不认，什么事也做得出来。我们只有退避三舍，少惹为妙，可是心里能无动于衷吗？

在这疯狂的岁月里，十几岁的中学生，连一些稚气未脱的女孩子，拿着铜头皮带，雨点似地打向自己的老师，没有半点迟疑。如花似玉的脸庞扭曲得变了形，眼睛里全是孩子们不该有的凶残目光。不光是皮带抽，更是用棍子打、用石头砸、用刀捅、用火烫、用开水浇，逼着吃屎，脖子上挂着四块砖还要在碎玻璃瓶渣上跪着爬，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酷刑都用到了自己老师的身上。更有甚者，连畜生都不如，把老师赶出去批斗，竟想在老师家里强暴师母。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设在六中的监狱，竟然蘸着老师的鲜血，在审讯室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那时甚至连小学生也像中了魔。在北京中古友好小学（位于钓鱼台国宾馆西侧，原为国家计委子弟小学，1964年更名），那些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竟在他们女校长的脑袋上钉满了图钉！

当时在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一个工作人

员丁大华在《文史精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在月工资只有二三十、三四十元的当时，这是一个怎样巨大的数字啊。问题还远不至于此，接着而起的是骇人听闻、如今都难以想象的杀人狂潮。

这时，江青惟恐乱得还不够，出来传话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直截了当的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个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说明，呼吁书是指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在天桥剧场会场上散发内容为反对打砸抢的呼吁书）

在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快又由杀教师，扩大到杀“黑帮”、杀“黑五类”、杀私有房主、杀毫无根据的所谓“阶级敌人”、甚至杀他们的亲属和亲属的亲属等等，形成了一股乱杀人的狂潮，在南北各地毫无节制地蔓延。其残忍野蛮的程度远远超过臭名昭著的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那一夜，德国法西斯党徒大规模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住宅，也只是杀害了91名犹太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破四旧期间，仅在北京就有3.3万户被抄，8.5万人被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仅大兴县，三天时间就杀了325人，灭门22户。死者中，上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最小的才是38天的婴儿（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年）。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尸体堆积，血水横流，只得放上冰块（此事及上面北京中古小学校长的事，请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这些极端分子又同时在“破四旧”的幌子进行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据《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记载，“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抄出后焚烧了8天8夜。”

就全国而言，这股杀人狂潮不断蔓延，后来疯狂凶残到什么程度，仅以湖南道县为例

来说明。1967 年夏秋之际，杀人狂潮冲击到湖南南部，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和对立面群众，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家属的家属，最终就不分青红皂白，失去控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命派”，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哪家就杀哪家，冲到哪儿就杀到哪儿。比如仅道县一个县，在 66 天内，就杀死 4913 人，自杀 326 人。杀人花样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绝非“惨绝人寰”、“血流成河”这样的词汇所能描述，即使跟日本鬼子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广西在 1968 年镇压“四二二”的过程中，居然剖心挖肝，甚至活吃人肉，创造了人类当代史上绝无仅有、真的是人吃人的惨剧，笔者都不忍在此复述。讲出来，能令天地失色、神人共怒。（具体事例，请见：《中国左祸》，文聿，朝华出版社，1993 年）。

这是怎么了？是什么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年青人甚至是孩童，变成了杀人的狂魔、吃人的豺狼？作为学生这样大规模地残害和杀害自己的老师，残害和杀害自己的同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人间惨剧，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解释，我认为，都没有说服力（当然，后期卷入杀人狂潮的已不只是学生了）。这儿我引用美国政治理论家汉纳·阿伦特的一段话，含义或许能接近些：“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

这决不是共产党人的行为，也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容忍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该明白的事。但是却发生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以革命的名义下发生了！这个使全世界震惊的恐怖“红八月”，使我对“文革”的看法，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就此逆转。

但是，能说吗？

或许，今天有人会问，这样的事没人管吗？

请听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 1966 年 8 月末部分省市公安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把打死人的

再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算好的了。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他还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请见：《狂飙》，丁晓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事后的事后，这类事情，被叫做“乱杀人”事件。这一个“乱”字，就不再有前因后果，抹去了是非曲直；这一个“乱”字，成千成万罹难者的生命就此湮灭；这一个“乱”字，杀人的罪责便烟消云散；这一个“乱”字，好像历史就从此了无痕迹。

几十年后，当我现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些问题清晰了，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像红八月这样的大规模驱赶和杀戮，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究竟是谁在策划组织指挥？那时，基层组织已经瘫痪，单位领导已经靠边，群众组织（除了中学红卫兵外）尚未完全成型。是谁，有这个绝对非同一般的力量？不得而知。网上有人为减轻极左势力的罪责，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刘少奇，说是他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这一套，想转移斗争大方向。这真是个天大的冷笑话。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任何的道理和依据。刘在 1966 年 7 月底，工作组被撤消之后，就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等着挨宰。所谓“资反路线”，不是指“红八月”，而是指在这之前 6、7 月份派出的工作组，企图压制群众、不让造反的事。随着 7 月末工作组的撤消，这套“资反路线”也就停止了。这个血债跟刘少奇和工作组毫无关系。或许，恐怖“红八月”真正的幕后推手，不知道的人是个谜。知道的人，不会说，或不能说。这些到街道里打人杀人的红卫兵，去之前是有人（有的就是当地派出所，有的是街道上所谓的积极分子）告诉他们去那家、去那家。现在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有民主思想的人为“带路党”，其实那个时候这个词还真能用得上。■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八）

——接受再教育

宋翔雁

一. 检修泥浆泵

打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旗号，工、军宣队一起进入了高等院校。时至六九年夏，工宣队在地院的作用有限，事实上给人的印象也就是一个摆设。工宣队至多也就是开大会时主持一下会场，真正掌握大方向、主事的都是各级的军宣队干部。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地院干尽坏事，迫害无数知识分子的都是那些军宣队的干部。相反，工宣队员给我的印象反倒比较注意政策和思考。

在 69 年夏，宣传队组织全院职工和学生去首钢 850 工地劳动，接受再教育。当时因病我正处于半休之中，所以军宣队安排我在实验室劳动，并让工宣队探工系副指挥刘××监督和管理。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全面检修一台苏式 200/30 往复式泥浆泵，确保学生出队时可以正常使用。全面检修就意味着必须完全解体，给却不给我安排助手，这样当大部件解体需用手动倒链起吊时（当时探工系实习室的装备条件还是比较差的，在室内起吊设备和实验用大块岩样，并无电动倒链），如何保持大部件本身的平衡和准确就位，确实是有相当难度的，而且要想准确就位一个人是根本办不到的。万一因不平衡，大部件（这里指的就是皮带轮、离合器、减速齿轮轴和曲轴大齿轮组件）在起吊过程中很可能会歪倒，而发生大部件落地被砸坏的事故。我想这也可能是军宣队不懂业务瞎安排所致，但也不排除是有意出难题，找茬儿整人。对此我要有所警觉，绝不能大意和勉强从事。故我当时就想好了预案，在该组件起吊前，我自己可先试试能否平衡吊起，若三次试吊均有歪斜不平衡的现象出现时，就绝不能蛮干。而要请示说明情况，提出需请实验员前来帮忙的要求，否则

只能暂缓该组件的拆解，先修理或更换其他元器件。

当我正式开始检修时，水泵已被其他同事卸载在钻机实习室内，有点像道具已经运到，就等我来开场似的。我每天从八时工作到十二时，中间没有平时的工间操，但一切均井井有条的进行着，卸缸头、拆卸进排水阀和阀座、卸十字头、拉杆、曲柄和轴瓦（曲柄因大组件尚未吊离，故还不能从泵体内取出），这一切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当要起吊皮带轮、离合器和减速齿轮轴和曲轴大齿轮时，果然因一头过重，很难平衡起吊。试了三次都不能确保平衡后，我随即向刘代表请示道：刘师傅，这个部件是由四个部件组合而成的，只能从泵壳内吊起后，再放到地面上才能拆解开来。但它本身一头沉，起吊时很容易歪斜而导致坠地事故，所以我需要请一名实验员来帮忙。在起吊时，请他帮忙控制组件的歪斜，保证起吊时的安全。自从检修开始，刘副指挥就一直在实习室专注地看着我干活，什么话也没说过。这时听我喊他刘师傅，起初一愣，但当听完我的话后，毫不迟疑地说道：没问题，你看找谁合适，就让他过来帮忙吧。

这样我就到实验室找朱春发师傅来帮我。因我事先已将大组件的绳结绑好，起吊时，朱师傅帮我扶住组件的皮带轮，这样在起吊过程中组件就不会再转动了。我们很容易就将该组件吊离水泵壳体并卸到地上，谢过朱师傅后，我拆下了皮带轮、离合器，减速齿轮轴和曲轴大齿轮，使大组件解体为四个单独的部件。当所有元件都拆解并清洗完毕后，我检查了需要更换的元件和可以修复继续使用的曲柄轴瓦，再按检修要求，作了笔录登记，将需要更换的零件单独堆放。然后向刘副指挥汇报拆解工作完成，说明轴瓦刮修后仍可使用，其他单堆放在一旁的零件则需更换。

刘副指挥大致看了一下登记的表格，问道：你们每次检修都要填写这种表格吗？我说：大修的都要求填写，还要补上开始投入使用的时间，以便确保每次大修的时间间隔。听毕他点了点头。

二. 刘师付跟我聊天

刘副指挥对我的工作挺满意。让我洗洗手，跟他聊聊。我还以为他要和我谈谈有关我的问题呢，没想到当我洗好手坐下后他却说道：我看你修理设备还比较在行嘛。面对他的夸赞，我实事求是地说道：在行谈不上，只能说还会修吧。

接着他就很不解地问道：姚文元的文章不是说“学理工的不会开机器吗？”针对他的提问，我谨慎但又事求是地说道：解放前毕业的工科学生是否都会开机器我不太清楚，但像我们这些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人应该都会开机器。因为大家除了要学习很多理论科目外，还要参加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而且在一年级时，还有一周多的参观实习，加在一起，总的实习时间有半年之久。大家开机器，只有开得好和差的区别。至于完全不会开的，可能也会有个把人，那是因为胆子小或本人的动作协调性太差造成的。这些个别人没有代表性。但对姚文在这段话中违背常识和不科学性的一面（譬如，“开机器”一词就极不科学，也不严谨），我十分谨慎地回避了。

我说完后他又点点头问道：你是学什么的，哪年毕业的？我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专业和毕业时间，并说道：我工作已经十年多了，在设备的修理技能方面，主要还是毕业后在工作和科研中慢慢学会的，在学生阶段不可能什么都学到。比如，六十年代初，在改装钻机试验台时，刚才来帮我吊装的朱师傅，就手把手地教过我重量大的零部件，吊装前绳扣扣结该如何打才能避免滑脱。这些最基本的干活技能，只能在实际生产劳动中学习，不管学什么专业，学校教的只能是最基本的。有两句老话说得很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才成。

对于最后我讲的这点浅显道理，作为一名老工人，肯定他要比我清楚得多。所以，他只是接着问道：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安装了？我说：等一会儿我要将需更换的零配件明细送交实验室办公室，请他们审批后帮我准备好。明天一来，我需要先刮磨曲轴大瓦，直到曲轴瓦的接触面积达到80%以上时，才能开始安装。此外，摩擦离合器的摩擦片，我觉得

还能继续使用，但摩擦片表面光滑了些，是打毛一下，还是将其更换，我没有把握。还得请实验室刘主任来看看，但他今天没在。若真需要打毛处理，我也得请人来帮我，因为这么大的摩擦片，我从未打磨过，万一打磨不平，反而会报废。我说完后，刘副指挥说：那就这样吧，等明天来后再说。

和工宣队队员的沟通让我觉得心情舒畅，因为他们谈话的态度首先就给人以平等相待的感觉，没有军宣队员那种盛气凌人、高人一等的训斥味道。而且，从刘副指挥的疑惑中也让我感到，他毕竟是从生产第一线中干出来的，并非完全是一个惟上是从的干部，他肯从客观观察中去思考和判断，这才能算是真正有觉悟的干部。而在以服从为天职的军队体制下，再加上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都得执行的要求，简单地将军宣队员和工宣队员作比较，恐怕也欠公允。

第二天上班后，我先请刘士迈老师（实验室主任）来看离合器摩擦片的情况，他说：虽然还可以用，但不值得再打磨了。还是换个新的省事，重要的是可以保证下个大修之前不用再次修理和更换了！说毕，他又让实验员将要更换的了零配件送过来，并问我还需要些什么？我说：若刮瓦顺利的话，到时安装皮带轮和曲轴组件时，还得请朱春发师傅来帮我吊装。如果刮瓦不顺利，可能会拖到明天再吊装。

刘老师听后说到：行，到时你去叫他就是，我会先向他打个招呼的。说毕又补充道：一个人干活悠着点，注意安全。刮瓦进行的很顺利，随后我很快将需提前装入泵体的十字头、拉杆和曲柄安装就位，不到十点我就请朱师傅再次前来帮我将曲轴大齿轮组件和皮带轮、摩擦离合器和减速齿轮轴组件分两次吊装就位。然后，我陆续将已安装就位的零部件互相连接牢固。十字头滑块和曲轴瓦的间隙调好、并注入润滑油。最后将缸套、阀座更换后，再将柱塞橡胶环安装就位并调好间隙，装上新的进排水阀门，将缸头、拉杆盘根紧固后，最终将进、排水管安装到位，整个水泵的大修工作就全部完成了。这时我一看表，时间已经快十二点半了，因为一切都有序地进行着，我竟一点也没有察觉！为此，我只好对刘副指挥表示歉意：对不起，我没注意时间，要影响您吃饭了。他大约也看出了我的兴奋

劲儿，笑容可掬的说道：没关系。这就算完工了吧！我说：还没完工，明天还得来灌水试泵，如果排水量达标而且稳定，曲轴箱和十字头温度正常，那是才算完成大修了呢。

第二天的试车非常顺利，灌满水后开车一次成功。运转半个小时后，十字头和曲轴箱的温升也正常。至此，经过近六个半天，苏式 200/30 往复泵的大修工作就结束了。从刘副指挥的表情也可看出，他对我这一周来的劳动是肯定的。当我关车后，他对我说：回去以后，你把这几天的劳动情况写个总结给我，有什么收获和体会，有什么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都可以写出来。因你还在半休，给你三天时间够了吧？答应后，我看到刘副指挥没有回北五楼办公室，而是往实验室办公室那边走了，可能他还想到那边听听实验室成员们的反应吧！但我深信他们对这次任务的完成情况肯定是会满意的。当我将总结交给他，他直接告诉了我：实验室方面的人，对你这几天来的工作都很满意。但他并没有谈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政治思想工作者比较普遍工作方式——对直接表态极其慎重。

当第三天我去北五楼宣传队办公室交劳动总结时，刘副指挥向我说道：张指挥长得知水泵检修任务已经完成，让你下午随车前往石景山工地，继续和大家一起劳动，接受再教育。那边可以煎药，你可以带上药锅、中药和行李、换洗衣物等，在那边半日休息半日劳动。面对军宣队这种让病患人员带着药锅去现场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的安排，看似笑话，但却是事实。这种决定对一般病患者来说，往往会冠以“革命化”的要求，而对于有问题的人来说，则是带有强制性的改造措施了。因此，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军宣队已经把我当作清理对象看待了，否则不至于如此。

三. 清队中的李砚藻

当工、军宣队进入地院后，其主要工作尽管表面上讲的是：批派性、搞好大联合；抓好“斗批改”。但实则如前所述，前者只是后者的切入点，而后者又只放在斗和批上，并以清理阶级队伍的面目出现。至于改的问题，即毛主席在 1966 年 5 月 7 日给林彪的信中提

出的教育要革命的问题，在落实“五七”干校的指示之前（这里指的是落实毛主席于1968年9月30日批转的关于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指示），则根本就没有提及，更不要说具体做过哪些教育改革方面的工作了！如果从“改革教育”的角度来看工、军宣队在地院的作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除了破坏、砸烂、瘫痪了原来的教育体系和管理制度外，毫无积极的探索和建树。甚至还远不如东方红掌权时革委会所做的相关教改的回顾和总结呢！

但就具体时间而言，清队（即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工作何时全面展开，在我的印象中却不很深刻，因为工、军宣队似乎没有像工作组搞“反干扰”动员大会那样，在全院大会上统一宣布。但从面上了解的情况看，各个系和基层单位则是按统一部署，各自分别对相关人员进行审查、个人交代和基层批斗等项清队工作。因当时我自己就是被清理的对象，再加上家庭负担的加重，所以对全院清队运动的关注度就明显不足。而且，在此期间，尽管审查对我个人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给予我的精神压力却远小于“反干扰”时期。其原因主要在于，反干扰时已将反工作组定性为反党、反革命，这样一项巨大的政治帽子，确实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即使自己再怎么说明动机是好的，但事件已被定性，厄运也就难于逃脱了。

我自知自己没有个人历史问题，在历次运动中也没有犯过政治性错误，“反干扰”期间的问题，军宣队没有那个胆量去翻工作组的案。基于我内心有底，所以对来自工、军宣队的相关审查，我认为真正值得认真对付的也就是关于简报组问题的审查，因为，随着工、军宣队的进驻，就意味着由造反派所主持的革委会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此间所做的一切被审查也就成为必然。但对自己在简报组的工作，我个人也是信心满满，觉得最多只能说简报反映的情况不准确、存在派性，绝对不可能上纲上线到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地步，而使问题的性质变成反革命的性质。而且，在清队工作全面展开后，简报组的审查早已结束，而且此后再无人向我调查有关简报组的问题。总之，直至被宣布我和昭明将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之前，在京清队期间对我只不过是校友冲击而已。

除个人被审查之外，我所知的全院清队情况有限。但给我的总感觉是：工、军宣队领

导的清队工作重点似乎并非党委中的所谓黑线或走资派方面的问题；也未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句话，针对的并非都在上层，而是针对全院职工的全面审查清理，以便对地院教职工重新进行左、中、右的阶级阵线排队。所以几乎每个职工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甚至连同家属、亲属也均不能逃脱。如今我能回想起来的几名普通教职工和家属被清查的情况有：

探工系全日制钻探教研室就针对李砚藻老师的个人阶级成分的划定进行了审查、交代和批判，还让其将过去利用房租收入所得购买的私人物品上交，以表明划清了界限；掘进教研室原党支部书记、系总支委员王首魁老师妻子成分的审查。因她本人是家庭妇女，只在家属委员会组织的缝纫组内从事个体劳动，但说她家庭是地主，其本人是否构成地主成分有不同意见，若是则将面临被遣返回原籍的处理。所以王老师当时的精神压力很大，在一次闲聊中他无意与我谈起此事，因我搞过四清，在农村参加过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知道一些政策。所以，我曾向他做了相关说明和解释。当时我曾告诉他：你岳父本人是否是地主，决定于他在解放前两年时的经济状况。要注意的是“前两年”，既非笼统的解放前，也非土改划定成分时的“当时”。若那时家中土地业已出售，而投资于城市工商业，本人不再雇工收取地租，那就不能划为地主，只能定为工商业者或资本家。至于他女儿，那要看她当时是否年满 18 周岁、是否已婚、是否正在求学等？若未满 18 周岁，则不在划定个人成分的年龄段，不予划定成分。这时需注意，“周岁”是指达到出生日期时的年年龄，而不是指到了出生年份的年龄。严格讲，差一天都不能算到了周岁的年龄；如已婚，则其成分应随夫家；若正在求学，则本人成分应定为“学生”，即使学校当地尚未划定成分，亦应视为“学生”。若其本人当时不满足上述条件，且闲赋在家，则要视其当时是否主持或协助主持家政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成分的划定就相当困难，会有相当的人为因素干扰。这些解释对他了解、把握农村人员的阶级划分肯定有所助益，他不仅本人是个党员，而且大学毕业后还作为肃反干部延后分配一年，所以他听得非常仔细，还问了一些细节，并道谢再三才彼此分手。以后他爱人的情况如何，因我自身难保，故也从未打听，不知其详。

四. 任大本和他的弟弟

掘进教研室的任大本老师（即前述帮我们争取结婚用房的老师），其弟（其名字我已忘记）是中科院数学所华罗庚的关门弟子（研究生），因其是右派，文革期间又因揭其有攻击江青言论被收监拘捕，拘捕收监时的监外监护人填写的就是其兄长任大本老师（因他本人未婚，在京也无其他亲属）。为此，清队期间，任老师也因其弟问题的牵连，加之在反右期间，他本人对个别右派有些同情言论，曾被定为中右，故也受到一定的审查。但在谢富治的公安六条从严、从快、从重整治的要求下，其弟最初由北京监狱收监改为转移到太原监狱收监，并于 69 年九、十月间被判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尽管随着其弟的被枪决，对任大本老师的审查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这类因亲属问题被牵连而受到审查的人，在文革中绝非个案。

在这里我还想就任老师及其弟弟的事件多写几句，好让今天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和他们面对不公正对待时所持的宽阔胸怀增多一些感性的了解。当然，我也希望那些在那个时代助纣为劣的人们，也能从中有所反省和忏悔。事情的简要情况如下：我于 80 年中去杭州出差，顺便到地矿部杭州地校看望任大本老师（他因长期两地分居，于七十年代中北京地院迁往武汉时，调至杭州地校）。在他家里我不但受到了贵客般的接待，还有幸聆听到他讲述的感人而凄惨的一段往事。

任老师说道：他出自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有三兄弟和一位长姐。长姐家住嘉兴，长兄抗日战争时期参军抗日，因是空军被送往美国接受训练，回国后一直和日军作战直至胜利。后因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其兄解放前赴美定居。其弟才华出众，56 年被录取为华罗庚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深得华的喜爱。但不幸 57 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华的呵护下，其弟的学业仍得以保留，没有被下放改造。但文革开始后，因与他人谈论过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劣迹而被告密，随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拘留收监（此时华罗庚也再无力呵护），并在 69

年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执行后一周有余，作为监护人，他才从学校方面转来的通知中得知他弟弟已经故去。大约在 80 年春，山西公检法系统派专人赴杭找到任老师，给他带去了其弟反革命案件经法院重审后，被宣布无罪平反的通知，而且给他送去了其弟生前的遗物。当相关手续办完后，公检法系统的来人向任老师说明了国家有关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规定，希望任老师提出后，他们再带回去研究后决定最终赔偿额度，若无异议即会叫任老师收存。闻后，任老师即表态说：因家中长姐现住嘉兴，此事需等告知她后方能决定。故山西来人决定先回住地，等任老师姐弟商定后再回山西。

此后，任老师仔细地看了其弟留下的遗物，发现其中除了少量的生活用品和衣物、书本外，还留存了很大一摞各色纸张（即大字报用纸），上面写的都是一些数学式子，他也看不明白，但肯定是他弟弟在狱中思考和推导的有关他研究的课题方面的东西。面对这些记载，任老师讲道：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自己的眼泪，只能任其流落在弟弟遗留的手稿上了。他继续说道：从这份手稿中可知，弟弟在那样的环境下，满脑子想的仍然是他热爱的数学。尽管他谈论过一点有关江青的风流轶事，那也只说明他从过去的报刊中了解的一点情况，哪有什么恶毒攻击的意图呢？！

接着他又说道：他整理好遗物后，就立即赶往嘉兴，向其长姐面告一切，并相商了有关国家赔偿的事情。姐弟二人相商的结果和理由，我相信不仅是今天大多数的人们想不到的，而且，即使是当时的很多人，大概也不大会想到。当山西公检法的人再次来到任老师家中想得知他们姐弟二人的想法和要求时，任老师代表他们姐弟二人坦诚地讲述了他们的意见和理由：我弟弟的错案得以昭雪，令我们姐弟二人感到欣慰。他无辜地故去不仅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损失，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他很有才华，也很专注他的事业，但可惜尚未学成，未能给国家效力，就被屈致死。这是很不幸的事，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他从中学到大学、研究生阶段的生活费用主要都是国家和人民供给的，家父和我们给予的有限，而且我们现在都有工资，所以，我们决定不再要求国家给予赔偿

了。但我们有两点请求：1，请将对他的平反结论转知中科院数学所，恢复他的名誉。并请转告他的导师——华罗庚先生；2，我们在清理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他书写的这份文稿。因为已经写就十年有余，是否还有价值，也请转数学所审查。如还有刊出价值，我们希望能给予发表，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如已无任何学术价值，则作罢，不必退还。因为我们也不懂得，不想再留存它。

山西公检法的人听后，请任老师在笔录上签字后即离去。但这感人的事到此并未结束，就在拒绝要求赔付后不久，同年夏季，任大本老师的哥哥从美国回国探亲，住在杭州。在姐弟三人相聚的欢乐时刻，任老师的哥哥问起了小弟的情况，问到了他是怎么死的？何时死的？任老师事前就想到了其兄长会有此一问，为了避免其兄长对党和国家的负面看法，决定对他隐瞒事件的真相。故说道：是69年得病死的。当问起得的是什么病时，任老师含混地说道：是和爸妈得的同一种病（暗指肺病。任老师解释说，其兄在国内期间，江浙一带得肺病的人很多，而且死亡率也较高，其兄长是知道的，所以容易骗过）。

当他兄长知道这一情况后，也就不再多问了，只是喃喃地说道：肺结核现在有药可以治呀！任老师就推脱道：他在读研究生，发现太晚了。任老师强忍下了个人的悲痛，为了国家的形象和利益，以此遮盖了文革期间，中共当局残酷杀害一名普通知识分子的丑闻。这则动人的事迹，反映出那些心怀坦荡，爱国家、敬事业的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胸和情怀。尽管这些人的头顶上没有任何政治性的光环和时尚的称号，但他们才是国家崛起、民族振兴的真正脊梁！此外，电工实验室实验员李宽，因历史问题被审查。可能因其隐瞒的问题被查清或不严重，加之本人持有经黄永胜签字的起义人员证件，故在全院清队宽严处理大会上，被宣布“从宽”处理。当宣布时，坐在我身边的屠厚泽老师（探工系副主任、副教授、系总支委员，当时是半工半读教研室的负责人）笑着对我低声说道：巧了，刚好是黄永胜的签字，如果是彭德怀的签字，恐怕就不好说了！从屠老师的这句不经意的话中，就可以看出，军宣队领导的清队运动成果，在地院职工心目中的评价状况了。■

【述 往】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四）

王复兴

16. 陈伯达7月11日的接见

7月10日，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布置工作，“井”、“飘”、“零”冲击会场，围攻聂元梓，殴打孙蓬一。同一时间，“井、飘、0”大规模打砸抢，抄、封了“二组”（学校保卫部），抢了机密档案；砸了“南阁”（哲学系办公室）。“66”和“联战”联合举行集会、游行，抗议“井、飘、零”打砸抢。“公社”保持了克制，只是和平示威，没有武斗。

7月11日傍晚，聂元梓带领校文革全体成员，去人大会堂要求陈伯达接见，聂元梓让办事员通知我也去。我叫了黄虹坚一同去，以便有事好商量，我们俩人常在一起，比较谈得来。我感到，聂元梓此举是去找陈伯达“讨说法”，你“6.5讲话”，把北大搞成这样，“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怎么办吧？向陈施压，要他负起责任，解决北大问题。20来人到了人大会堂，要求陈伯达接见。在一个会议室等了很长时间，约有一个小时。尔后，陈伯达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陪同下来到会议室。陈伯达穿了件麻质短袖衫，敞着怀。聂元梓简单讲了北大的混乱情况，讲了前一天10号发生的打砸抢事件，问陈“怎么办？”陈伯达讲话有浓重的福建口音，不时停下来由傅崇碧给他翻译成普通话。陈说“几个人就是要跟你们北大一万人做对，有什么办法呢？”“人家知道不跳就活不下去。”“天塌不下来，大家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回去睡觉。”我听了陈伯达说的话，当时感觉较好。理解他的意思是，支持校文革，让反对派去表演，表演的越充分，暴露的越充分，垮的也就越快。

他一再强调“要学会睡觉”，是让我们沉住气，静观其变。当时聂元梓还不肯走，似乎要静坐施压。我一看，这么僵下去不是办法，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呀，见好就收吧。于是站起来招呼大家“走吧，走吧”。傅崇碧也一再催促：“伯达同志讲了，叫你们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回去吧！”这样，大家就撤了。第二天，我在“66”的核心圈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大家对他的“要学会睡觉”之说，与我理解一样，很受鼓舞。

1967年3月以后，北京高校的一些组织（后来大多被称为地派）要打倒几个付总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李富春、余秋里，另外一派（后来大多被称为天派）则只“炮轰”，不“打倒”。当时北京高校出现了“炮轰派”和“打倒派”的分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属“打倒派”。6、7月时有好多“66”的群众问我，对“二月逆流”的几个老总，“66”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一律回答“对几个副总理，我们‘一批二保’，他们有错误，可以批判，不能打倒！”我心里明镜似的，对几个副总理是“炮轰”还是“打倒”，实质是对周总理的保与反之争。“一批二保”的目的就是保周。

7月中旬，风闻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与保守派“百万雄狮”对立。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支持“百万雄狮”。造反派反军区，反陈再道，两派斗争激烈，中央文革已去了武汉。7月20日发生了什么，我当时不知道。21日晚饭后，任瑚琏找到我，说“中央文革王力在武汉表态支持‘三钢’、‘三新’，王力、谢富治被‘百万雄狮’扣了，后台是陈再道。一会儿在五四操场开声讨大会，给你个发言稿，你代表新北大去念吧。”他把写好的稿子给了我。开大会时，我上台念了讲稿，最后领着校内外几千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陈大麻子！”

过了一天，7月23日，中央文革通知北大校文革，全校师生去西山，去京西宾馆示威游行。两派都去了。传说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陈再道也在。路过京西宾馆，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比较响亮，我没看见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游行路上，听到某单位的大喇叭广播，“江青同志说，左派要‘文攻武卫’。”（后来流传陈毅讲，“江青一句‘文攻武卫’，天下大乱’。”）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群众大会，迎接王力、谢富治回京，声讨“7.20武汉反中央暴乱事件”。林彪出席并讲话。按中央文革和市革委会指示，北大两派都去了。

“井、红、团、零、飘”在西校门外抢占接人去天安门的大卡车，不让“公社”的人上车。其实车辆足够，两派群众都去了。

我那段时间曾去清华看望于宁、方美琪这一对好友，他们对我说“现在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没劲！以后当逍遥派了。”

17. “66”、“联战”联合，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

大约是7月23日，聂元梓派办事员找到我，给了我一张她写的纸条，我记得纸条上写的是：“王复兴、索世暉：希望66串联会和联战尽快联合，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可和卢平商量。聂元梓”第二天中文系的卢平找我，说“66”和“联战”联合，“公社”总部的人选方案，可以是4比3，“66”出4个，“联战”出3个；也可以5比4，你们5个，我们4个。你们“66”担任主要负责人。我当即说，你的方案我同意，但主要负责人不一定是“66”的。

大约在7月24日至26日，我召集“66”核心成员开会。我知道这帮人都不爱当头，于是讲了聂元梓的纸条，讲了和卢平协商的方案，然后一个一个动员“出山”。索世暉坚决不肯。金崇顺也不肯。沈永友很痛快答应了。李长啸第一天不同意，第二天同意了。索世暉推荐了刘存哲，介绍他在福建造反派中威望很高，大家同意。阎志胜找我，毛遂自荐，愿意进总部。我向大家介绍说，阎志胜在清华文革初期介入了清华运动，在蒯大富受压时，坚决支持他造王光美工作组的反，他当时对老蒯说，你造反，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你干！因此我常看到清华团派有人来北大找他。大家都同意他进总部。沈、李、刘、阎，这是4个人了，但他们谁都不愿当总部主要负责人，我也觉得没合适人选挂帅，于是提出“66”应再多推举1人进总部。索世暉说生物系六年级有个李文，他反工作组，工作组把

他打成反动学生，他在学部的女朋友偏在这时候找他结婚，他老婆在学部是反吴传启的。李文介入了贵州文革，在贵州造反派中名气挺大。大家都觉得李文这人挺棒，应推他进总部。这样，“66”推举了5人进总部。

当时李长啸动员我也进公社总部，对我说：“没关系嘛，你也进总部吧。”他所说的“没关系”，我明白是指“家庭问题”没关系，不用顾虑。我当时已打定主意要退下来。前二天井岗山广播台还点名攻击我，说什么“喝美国牛奶长大的王复兴”如何、如何。王渊涛也听到这个广播，特意告诉我。我想，我如进了总部，“井岗山”准会拿我“家庭出身”说事，对我不利，还会影响“公社”，何必去当人家的靶子呢？我的历史任务完成了，立意要坚决退下来。

7月28日，改组、重建的“新北大公社”总部成立。核心组组长是孙月才，付组长是：卢平、沈永友，因孙月才常常去上海，实际主持总部工作的是卢平。核心组其他成员是：李文、李长啸、阎志胜、刘存哲、刘冲、曹芳广、黄元庄。

8月1日，重组后的“新北大公社”新总部向全校做了公布。同时，各系的“66”和“联战”的成员也联合，组成各系的战斗团。索世晖被推举为中文系战斗团团长。历史系战斗团团长是原“联战”的丁建华（后改名为丁建南）。

大约在8月2日左右，索世晖通过沈永友、李长啸向“公社”总部提议，由他和王复兴组建一个“作战部”，隶属于总部，负责文攻任务。总部批准，“作战部”办公室设在“总部”楼下。“作战部”由索世索和我负责，其他成员有：扬子浪（谢定国）、陈双基、马西沙、张绍清、任瑚琏、。总部经常与“作战部”联系的是李文，李文实际上是“作战部”的领导。8月的一天，聂元梓找索世晖，让他推荐一人代表她常驻“首都红代会”。索同我商量，他建议中文系三年级的马云龙，我觉得挺好，索向聂元梓做了推荐，聂元梓随后采纳。

18. “红梅”战斗队坚持批极左、反极左

7月时，“红梅”战斗队认为斗争大方向是批极左、反极左，而不是反右。“红梅”战斗队基于当时的思想状态，干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红梅”起草并贴出了一份质量较高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这是由王渊涛、陈双基、俞政和我4人合写。大字报的中心思想是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破坏一切的错误倾向。当前应反左，不是反右。指出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点名批判了吴传启，指出他本来就是国民党，有党员证。指出吴传启及其后台在推行一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革命派要奋起与这条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大字报指出吴传启有后台，影射了林杰、关锋。这篇大字报是个重型炮弹，影响很大。

还有一件事是：当时“红梅”了解到中央文革有个调查员叫张超，是个女的，40岁左右，以《红旗》杂志社记者名义长驻北大，公开支持“红旗飘”、牛辉林。6月5日以后，她一天到晚往“飘”、“零”那里跑，经常参加“井、红、团、零、飘”的串联会、队长会。专门为林杰、王、关、戚提供不利于“新北大公社”的材料。她时常散布不利于校文革的消息和言论。6月12日在43楼232室，在物理系“革造团”队长会议上，有些人批评“团”派总部对聂斗争“右倾”。张超参加了会，并给会议主持人写了纸条：“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写出个座谈纪要来。”了解到张超这些活动，我们“红梅”开会商量，需要教训她一下，让她不能乱汇报，净抹黑；不能支一派、打一派。于是我去找了张超，说有情况向她汇报，请她到38楼我们宿舍去谈谈。到了我们38楼313室后，“红梅”七个人围着她，对她讲了北大形势，警告她不得乱汇报，不得支一派打一派，教训了她一通。当时来这么一下子，也有“敲山震虎”的意思，向张超的“上面”传递一个信息，你们要搞什么阴谋，我们盯着呢，“新北大公社”不是好惹的。此事聂元梓根本不知道，是我们“红梅”几个人胆大包天干的。

8月2日，中央文革关锋在人大大会堂召见聂元梓，对聂说：“你们围攻记者是错误的。你要向记者道歉。难道你不知道，张超不是《红旗》的，是中央文革派的吗？”

8月3日，“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不许聂元梓围攻张超同志！”“聂元梓必须向张超同志道歉！”同一天“井冈山”贴出大标语：“不许聂元梓围攻张超同志！”

19. 文攻“作战部”做的几件事

8月时，负责文攻任务的“作战部”成立了下属的写作组，取名“新北大人”，由我负责，成员有：张绍清、陈双基、曾镇南、扬子浪、王渊涛、俞政。主要的“笔杆子”是三个人：曾镇南（中文系二年级）、扬子浪（原名谢定国、数力系四年级）、张绍清（历史系四年级）。曾经以“新北大人”笔名贴出过一些质量较高的长篇大字报，有批评“井冈山”要“砸烂校文革”是方向性错误的文章；有批判左思潮、反吴传启的文章；有呼吁两派停止内战，主张大联合的文章，等等。

大约在10月底，索世晖和我商量，他提议由“作战部”组织、成立一个大型的文艺宣传队，取名叫“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团”并由任瑚琏任“胜利团”团长。我和任瑚琏都觉得他这个主意很好，天天打派仗，人们都觉得挺没意思，人心涣散，搞些大型文艺活动可振奋、聚合人心，给枯燥的生活添些乐趣。“公社”不乏大批文艺人才。任瑚琏很快拉起队伍，并举行了成立大会。我参加了成立会。会上索世晖、任瑚琏做了讲话。

“胜利团”的艺术骨干编写并排演了毛主席诗词联唱：“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后来又编写、排演了大型歌舞剧“抗大之歌”。该剧排的挺成功，观众都感觉艺术水准挺高。这是个集演唱、舞蹈、话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歌舞剧。黄虹坚是演出队员之一、舞蹈队的领舞，她的动作收放自如，有股韵味，我挺欣赏，不知她什么时候练成的。每场的转换都由司仪出来朗诵诗歌作为下一场的“引子”，司仪兼领诵人是中文系的郭瑞，他身高马大，穿着八路军军服，往台角一站，高声朗诵，中气十足，吐字铿锵。扬子浪评道：“郭

瑞很有气派！”歌舞剧的舞台背景与灯光挺讲究，延安宝塔山的布景挺漂亮。“胜利团”每次演出节目挺多，如：毛主席诗词连唱、还有小节目：对口词、小品、舞蹈等。“钢琴伴唱红灯记”也很受欢迎。担任“铁梅”演唱的张敏（外语系英 2 学生），每次演唱完都要谢幕多次并加演。人们评论张敏的旦角唱腔达到专业水准。张敏后来成为我的夫人，她从小就喜欢国粹京剧，而旦角唱腔的嗓子是天生的，没有经过什么专业训练，只是在文革前，在北大京剧队玩过二年。后来“井冈山”也学“公社”，成立了大型文艺宣传队“万岁纵”。两派的“胜利团”或“万岁纵”演出时，两派群众都不分彼此，踊跃观看。对大联合有点促进作用。“胜利团”还应北京各高校、工厂、机关、部队之邀，频频出去演出，很受欢迎。那时没有电视，也没什么电影，只有八个样板戏，文学艺术领域如一片荒漠。“胜利团”的每次演出，对那时的人们来说，是个难得的精神盛宴。■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